

戰時經濟叢書

# 戰與財政

柏登著

楊樹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S  
E311.9  
1

H. Pantlen 著  
楊樹人 譯

戰時經濟叢書  
戰爭與財政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96 3574 7

## 卷頭附語

譯者請在正文之前，借一短小的篇幅，附述兩點。

在譯述的技術上，首先要聲明，大體上是求與原文嚴格符合，不加增減，雖說在有些地方，出於文字技術上的理由，不得不採比較任意一些的筆法，以求適於閱讀。此外原文的筆法是研究室中流行的綱要式，即是說，著者於着筆之時，存心利用文法的結構，把若干句的意思堆積在一句之中，把若干節的內容，密化在一段之中。本來在研究室裏，在有人演述的時候，聽衆大都對於演述的問題不是門外客，不但沒有興趣聽冗贅的陳述，並且事實上也不需要如此，而演述人在擬稿時爲經濟時間，節省腦力計，也是向例力求做到字少義多的句法；至於在寫報告式的文字，則更是如此了。不過這種筆法，無疑是不適於研究室圈外人，或對於研究室文字向無接洽者的閱讀的；而再把這種筆法直譯成漢文，漢文的讀衆必然會感覺到文氣不接，爲補救計，在過於不接氣的地方，不得不

稍爲增補一兩句，或是把原文密化的文字，稍爲放長些。然而這種增或放的處在，畢竟是不甚多，所以若在譯文仍舊發現拗口的處在，那只好請讀衆原諒，自行玩味文義，去尋求瞭解了。餘外，原文中有極少數的地方是明顯屬於過分感情衝動之語，專爲其本國消費之用，對於我國，毫無關係，在這些處在，譯筆曾分別其程度與內容，將其弱化或刪去。不過這種需要弱化或刪修的地方，誠如上面所說的，確是極少極少。所以在大體上說，譯者對於原著人可以負責的，其文義絕不因上述的小手術而有損害。

其次要在內容上，略述一語。本來原書的內容，具見譯文，實無贅述的必要。不過此處要特別陳明者，即原書是歷史式的、比較式的敘實文章，對於單調的數字，尤不厭逐一報告，除掉第五節而外，大都避免過於肯定的結論語，急於求結論的讀衆，或許要感覺到失望。不過原著人不願輕易以其已意影響讀衆，但求揭陳實在，聽讀者自求結論，也未嘗不是研究室和學者界中流行的謙遜美德。至於文末所附的參考書目，對於意在深究者，亦是一種比較詳細的介紹。所以原書雖說在原則探討上，未爲詳盡的陳述，然而在供給初次資料上，在介紹文獻上，對於一般研究戰爭經濟的人士，是

不無相當裨補的。

南京傅厚崗，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尚須附誌

# 目次

## 卷頭附語

一 裴列大王時代……………一

(現金的財政與充實庫藏乃是普魯士的特點)

二 解放戰爭時代……………一二

(以發鈔爲戰爭財政的工具)

(一) 法國……………一四

(二) 英國……………一五

(三) 奧國……………一七

(四) 俄國……………一九

(五) 普魯士……………二〇

目次

一

(六) 美國.....二二三

(七) 結果.....二二四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二二六

(重心移向於戰時借款)

(一) 英國.....二二六

(二) 法國.....三三〇

(三) 俄國.....四四〇

(四) 奧匈.....四四六

(五) 意大利.....五五〇

(六) 德國.....五五三

(七) 美國.....五五八

(八) 日本.....六六三

四 世界大戰……………六八

(編經不足乃以發行紙幣與公債爲助)

(一) 德意志帝國……………六九

(二) 奧匈……………七四

(三) 英國……………七六

(四) 法國……………七八

(五) 俄國……………七九

(六) 意大利……………八一

(七) 日本……………八二

(八) 美國……………八三

五 總論……………八五

參考書……………九九



# 戰爭與財政

## 一 斐列大王時代

(現金的財政與充實庫藏乃是普魯士的特點)

斐列王威廉一世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 不僅認識了枕戈待旦的軍隊對於普魯士在歐洲大國間的政治地位是至為重要，他並且自一七二三年起即集中了國家財政的管理。原來普魯士的財政是分爲兩大管理處的，一是國有公地管理處 (Domänenverwaltung) (在封建時代的普魯士，國有公地上的租稅是主要的國家財源。) 一是現金稅管理處，或稱「戰需」管理處 (Verwaltung der Geldsteuern oder "Kriegesfälle")。斐列王便把這兩者合併爲一般財政，戰爭及國有公地督理處 (das General Finanz- und Domänen direktor-

inn) 簡稱爲一般督理處 (General direktorium)。他尤其知道現金對於從事戰爭是很重要的，所以當其時，許多王侯邦國尚在濫用庫幣因而損及其本國的福利的時候，普魯士已經經由節儉的途徑集蓄起一千萬托勒 (Thaler = 3 馬克) 的國庫庫藏了，這數字按照當時的情形而論自然是頗有可觀的了。這筆國庫庫藏以及在一般督理處管理之下陸續而來的歲入乃能使裴列大王從容地從事第一次亞勒西亞戰爭 (der erste Schlesische Krieg, 1740-42) 以及大部分的第二次亞勒西亞戰爭 (der zweite Schlesische Krieg, 1744-45) 而不感覺到有重大的財政困難。

在繼此以後的和平年間，裴列大王曾計劃重行集聚二千萬托勒的庫藏，預計在戰爭爆發時，每年須增支五百萬托勒，這樣可以維持四年的戰爭。在七年戰爭 (der siebenjährige Krieg, 1756-1763) 爆發的時候，國庫總數已達一千三百二十萬托勒，可是七年戰爭的費用在開始時即很浩大，以至這筆庫藏在一七五七年 (即開戰後之翌年) 底即將近告罄了。於是裴列王也就不得不假手於當時所樂用的張羅財政的工具——製造劣質硬幣——，雖說他明知這種辦法對

於和平的工商業會有不利的影響的。

鑄造現幣原來是國家自己經營的，不過在戰爭爆發短期以前是租讓給企業人去經營了，企業人爲了其所享的特權須繳納一筆賦稅，一七五六年十一月最先核准了減質鑄幣（原來銀半磅鑄托勒十四改爲鑄托勒十八枚。）但這核准只在克萊衛（Cleve）與萊勃茨（Leipzig）地方通行的貨幣爲限，其時這兩地方尚視爲外國地方（二）這種劣質的貨幣係交軍隊在敵境使用，但不准復入普魯士疆境。在考林（Kolin）敗績之後，表列王迫不得已，乃將其內廷的藏銀運到馬格德堡（Magdeburg）去鑄造銀幣。他計劃就這批藏銀按照上述的減質比例鑄成六十萬托勒，這是普魯士境內的最先的減質鑄幣。待到一七五九年春普魯士迫不得已續鑄減質劣幣（最初每銀半磅鑄托勒十九又四分之三，繼則鑄三十枚）原來國家徵稅不收劣幣的禁令至此也不復

(1) Koser: Die Preussischen Finanzen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in Forschungen zur bairischen Münzgeschichte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Band VIII, Berlin 1900, S. 104 ff.

能維持了。一七六〇年，在薩克遜鼓鑄的品質更劣的劣幣（每銀半磅鑄幣四十）也不能禁止其

流入普魯士境內了，因為不然將無人承租鑄幣。結果，普魯士境內劣幣充斥，而良幣則在交易上完全絕跡。貨幣的購買力低降達於面價的三分之一。一七五九至一七六二年間，平均每年從鼓鑄劣幣所得的收入，據裴列王自稱有七百萬托勒（三）。但是根據科賽（Koser）則謂，該期間鑄幣的收入，能確實證明的共有二千五百六十萬托勒（三）；他甚且估計共有二千九百萬托勒。

從這鼓鑄劣幣上可以看出裴列王是抱着一定的原則的，即是在戰爭中竭力節養本國的民力。他的軍旅只有三分之一是在本國募集的。尤其對於新興工業的工人，完全聽其自由，不加以任何軍役。在緊縮一般支出之下，裴列王自一般戰爭國帑項下取得二千五萬托勒，又自其時尚屬獨立的西勒西亞行政處取得一千八百萬托勒。在戰爭開始時只向各省強徵了三百七十五萬托勒；但是普魯士佔領的敵境各區，尤其是殷富的薩克遜，還有波希米亞，則須擔負持久的賦稅和高額的捐輸。薩克遜在該次戰爭期間共付現金四千八百萬托勒，按照當時的情形，這不能不算是一筆

(一) Савров Y, s, 283.

(三) Koser: Die Preussischen Finanzen, 編者卷 2, 351.

鉅款，雖說一部分是以劣質貨幣繳付的。僅這一筆款項已經彌補了全部戰費的四分之一了。此外還有萊克楞堡與蓬賣恩（Mecklenburg u. Schwedisch = Vorpommern）約負擔四百二十九萬托勒，榜拜爾格（Bamberg）與維爾茨堡（Wurzburg）約共負擔一百萬托勒以上。（四）

從這一切方式得來的款額，仍然是不敷戰費之用，而且又因為斐列王不欲增加本國負擔的緣故，於是一七五八年四月乃與英國訂立助款條約，按照該約，英國應補六十七萬金鎊。英國助款大體上是以金銀條支付的，而斐列王則將其按照隨時鑄幣純銀率改鑄成劣幣。這樣，在領取助款的四年間一共鑄成了二千七百五十萬托勒銀幣。按照科賽總計前述諸財源，共得一六九、二五〇、〇〇〇托勒，（五）其中應減去在停戰時尚存有二九、四三〇、八一四托勒，故七年戰爭的結果，普魯士實支戰費約一萬萬三千九百萬托勒。此數與斐列王回憶錄中所列一萬萬二千五百萬之數相差一千四百萬，但此差額並不甚大，因為兩者都不能有絕對的準確性的。如果劣幣貶值的程度，能確實計算的話，那末總戰費大概還要低得多。

(四) Koser: Die Preussischen Finanzen, 前揭 S, 370.

戰爭的結果，普魯士不但沒有在軍事上敗北，並且在財政上也沒有造成嚴重的弱點。然而這七年戰爭則曾使其他參戰各國負有重大的債務：英國其費戰費約八千萬鎊，因而增高了國債六千萬鎊。法國的國債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鎊（*Live*，古法幣名，約相當於戰前法郎一法郎），奧國的國債達到一萬萬五千萬鎊爾盾（*Gulden*，古奧幣名，相當於二馬克）（六）。

(五) *Konig Die Preussischen Finanzen*, 前編 S, 371

|          |                 |
|----------|-----------------|
| 一般戰費項下   |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
| 西勒西亞行政處  |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
| 薩克遜行政處   |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
| 萊克勞堡 蓬寶恩 | 四,九五〇,〇〇〇       |
| 鑄幣稅      |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
| 補助金      |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
| 國庫       |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      |
|          | 共一六九,二五〇,〇〇〇 托勒 |

(六) *Prion Die Finanziellen Folgen Frührer Kriege*, Berlin 1927, S, 4

七年戰爭使斐列大王在國際地位上獲得相當的成功，他自然是不會輕易忽視這既得的地位，他很能利用這地位。他抱着真正的重商主義的觀念，在一七六五年設立起貼現采業銀行（*Gründungs-Bank*）和利華銀行（*Lehn-bank*）以爲金融交易的中心，其後改稱王家銀行（*Königliche Bank*）一七七一年又設立起海貿會社（*Seehandlungsgesellschaft*）促進工商業，這便是其後的王家海貿社（*Königliche Seehandlung*）和今日的普魯士邦銀行（*Preussische Staatsbank*）。因爲其時商人創業不甚踴躍，這兩個經營都是斐列王自出資本創立的。在最初的時候這兩大機關也即完全以斐列王對於經濟政策的觀念爲準。而這海貿社也確如其名稱所示，是自行經商，設立工廠並且對於其經營給予金融的援助的，直至十八世紀末爲止，這海貿社在相當範圍內實代表了當時大體上尚以手工業爲基礎的普魯士經濟的中心機關。最後他又設立起「鄉田信用協會」（*Landwirtschaftliche Genossenschaft*），係由大地主聯合組織，以共同的責任而接受貸款，於是那經由長期戰爭而遭難的農業乃有機會以較便宜的利率而取得資本。

這樣，因爲七年戰爭而稍行弱化了了的經濟，在上述的一切建設計劃實施以後，不久便又能使

斐列大王集聚起一大筆新的庫幣。誠如勃禮翁 (Prion) 教授所說，在這種充實庫藏的辦法上，我們可以明白看到當時普魯士財政政策的特點：普魯士的歷代國王大都懷着純粹私經濟的，即當時的官房主義派的信念，視積儲現款——視有實效的準備金——爲有效的保證，足以應付因戰爭而起的財政需求。(七) 在斐列大王垂死的時候庫幣的積儲達到五千四百萬托勒，而國庫的負債纔一千二百萬托勒，如此富餘的庫幣實數就當時的情形而論實是一筆大款。這筆富餘的庫藏會使斐列的後繼人在若干其後的戰爭中無須另行徵款，然而這種境地並未能持久。一七八七年的荷蘭之戰已經費用了國幣的大部，更加上反法國革命的諸次討伐需用浩大，所以在一七九四年這筆積儲即告用罄。因爲普魯士政府不欲增加稅負擔之故，於是此後所需的款項大都假手於借款之一途，一七九三年與一七九四年乃開始在外國，即在佛朗府 (Frankfurt)，荷蘭及喀賽爾 (Cassel) 借款。這種借款的辦法也並非毫無道理，因爲其時普魯士的錢在萊茵河上的戰地使用最要打折扣的，在外國取得的借款，自然是可以避免這種折扣的。至於減質鑄幣的嘗試，則未能

有足用的結果，因為其時一共鼓鑄約七百萬托勒，而戰費所需則遠過於此，已非現款所能彌補了。一七九四年普魯士已經準備撤兵，嗣以英國與荷蘭給予補助金，纔繼續作戰，可是因為普魯士未遵守兩國所訂計劃作戰，所以不久這項補助金又告停止了。一七九五年一月因為需款孔殷，乃至內閣發令徵收全國現金收入，以充軍隊給養之用。然而就是這辦法仍舊是維持不了，這財政的問題對於普魯士一七九五年四月五日在巴賽爾(Basel)決定議和，無疑是會有重大影響的。(八)

裴列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在一八〇六年又積聚起一千三百萬托勒的庫幣。可是不久以後拿破崙稱雄全歐，普魯士被迫負擔鉅款，一直到一八二〇年為止，普魯士王迄未能有積儲庫藏的能力。自一八二〇年以後，普魯士這纔再有國庫的積蓄。

有興趣的是俄國不僅在軍事上模仿普魯士，並且在財政上也曾仿效這普魯士的國家庫幣的榜樣。在俄國，一方面因為補助的資源尚未發展，一方面又因為在戰時需要，在財政上對西歐獨

(九) Ludwig: Kriegführung und Gold,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Truppenführung und Heereskunde, Jahrgang 4(1907)S. 307.

立，這種現金儲蓄自然是有相當的重要。不過這爲此目的而積蓄起來的國幣在一八二七年波斯戰爭上即已差不多耗用將盡，所以在一八二八至二九年的土耳其戰爭時是已經沒有多少可供支配了。

在一八六四與一八六六年兩次戰爭中普魯士的國庫積幣每次都是先行支出現款，而隨後再由賠款項下補償起來的。一八七〇年之戰，國庫積幣在八月三日即已完全告罄了；其時銀幣的存款是直接支用，而金幣則送普魯士銀行換取紙幣支用。因爲普魯士銀行的信用出於基則上的理由，不能供應戰爭目的之用（其理由將於下文詳述），所以自軍隊動員開始以迄於最先的信用借款成立爲止，這期間的過渡任務是完全要由國家的積存庫幣承擔的。

一八七〇年戰後，法國負擔鉅額賠款，德國計劃以這賠款爲基礎新立戰爭準備金，以金幣爲主，一八七一年此案在國會中討論時曾有人批評，以爲積儲大宗資本，不能生益，殊爲不當。俾斯麥其時對於這種責難會答稱，在一八七〇年戰爭時，普魯士因有戰爭準備金，乃能贏得數天的時期，足以使萊茵左岸的全部，未受法軍的侵犯。（九）同時當時國會議員密開爾（Dr. Miquel）曾謂，

在戰爭爆發後現金有避出交易流通的趨向，而另一方面貨物交易，則因勇於出售的關係有增加的傾向。這樣，通貨將有不足的感覺，很能造成經濟上的危機，這是戰時不可忽視的一個危險的局面。此時若有戰爭準備金原來不在流通之中的現金來補充這缺乏，是會能救濟這種危險的。(十)可是這戰爭準備金在一八七一年以後數年間，雖說尚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不久以後情形是變更了，便是上文所說的密開爾也都變更了其原來的主張，也許是受了那位財政學大師瓦格賴(Adolf Wagner)的影響。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密開爾處於普魯士財政部長的地位，於其上威廉二世的奏書中會條陳，把戰爭準備金的現金與國家銀行的現金合併，充實發鈔銀行的活動力，而便竭其全力供應作戰的需求。(十一)但在一九一三年時，戰爭準備金雖說早已無復重要，不像一八七〇年動員時所會有的地位，然而按照德國文案所述，(十二)其儲金之增加，則鑒於其時的

(九) 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S. 424.

(十) Reichstag: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II, Band, Session, 1871, S. 32.

(十一) 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Anlage, S. 300.

(十二) 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S. 464.

外交關係日益緊張，也確有迫切的必要的，因為在戰爭準備金項下積儲着的現金頗能使一般大眾感覺到保障，在戰爭爆發時可以避免掉向信用機關擠兌或提款的現象的。二萬萬四千萬馬克的金準備是只作準備之用，只有此外原定的一萬萬二千萬的銀準備，在必要時，可以流出外用的，因為預料在動員以後，軍旅支用銀幣的需要必然會激增的。不過這計劃的銀準備在歐戰爆發時只達到六百萬馬克，為數太微了，在支用以後也無甚重要的後果。

## 二 解放戰爭時代 (一八一三——一八一五反拿破崙戰爭)

(以發鈔爲戰爭財政的工具)

裴列大王雖說以現款的財政爲其戰時的財政原則，可是他對於這原則也有例外的。這例外是在於：他對於不爲敵人佔據的區域中的文官只發給「出納券」(Kassenscheine)，指定在講和以後兌現，而在發給的時候，文官們應各自尋覓其生活費。關於此事，其後曾有一報告說：「公務員的薪給出納券在交易上根本無人收用，換算時要打八折。誰要是曾在朋友處能設法而自行保藏此種出納券等到講和以後兌現的話，那末其時所兌到的是劣質貨幣，不過要作爲金價貨幣計算。這真是公務員們的大難，國王是不能過問他們的薪給的，因爲他不得不專心於供應軍旅徵集必要的資料之故。」(一)法國革命以後曾嘗試過若干新辦法，可是拿破崙一世則嘗試恢復裴列

(1) Richtofen, Frhr. von: Der Haushalt der Heere, Berlin 1889, S. 627.

大王的制度。拿破崙只承認有兩個財源可以供給其作戰的需用；租稅與捐輸，尤其後者可以使他把他的戰爭負擔轉嫁給那些爲其所征服的敵人。(二)「拿破崙認爲信用只是抽象的幻物；他視之無異爲國民經濟，學者的空論，玄虛的空中樓閣。」他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也未嘗不在於此，尤其他的主要敵人，英國，對於國家信用之爲物另有完全不同的觀念，這在下文還要敘述到。

### (一) 法國

法國的革命政府，雖說要應付聲勢浩大的敵人，然而差不多自最初的時期起即沒有什麼金錢的資源；因爲其時的法蘭西王國是負債很重，每年僅付息即需二萬萬二千一百萬法郎，而其時的歲入也不過四萬萬七千五百萬，這樣的窘迫的財政所能遺留給革命政府的，自然是極爲有限的。而且在革命初期有若干淆亂不清的決案會使租稅的收入暫時中斷，而其餘的國家收入則又因對外商業阻滯的關係，不斷地減退了。一七八九年國民大會決議出售國有公地，並且在此項公地的售價尙未收到以前就發行「鈔幣」(Assignat)支用了。原來這種「鈔幣」是國家債券，每

(1) Prion: Die Finanzquellen folgen usw., S. 5.

張一萬法鎊。可是其後（一七九〇）取消付息，強迫通行，於是就變成真正的紙幣了，並且其票額最小的逐漸減到三法鎊。法國前此曾聘用過蘇格蘭人勞氏（John Law）理財，他的辦法是發紙幣，一七二〇年紙幣的總額達到了三十萬法鎊，因而曾造成了空前的財政破產。可是在財政困難的時候，人們顧忌不了許多，於是又回復到勞氏的辦法了。

革命時代的發鈔，範圍太無限制，以至一七九六年總數達到四百五十五萬法鎊。其對原來金鎊幣的行市也同樣地低落了，一七九六年達到原價的三分之一。

## （二）英國

拿破崙的大敵就是英國。打仗總是要錢的，英國當然不能例外。所以一七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英格蘭銀行也就只好宣布停止鈔票兌現了。同時鈔票也是以一定的行市強迫流通。因為英格蘭銀行一向享有良好的信用，一直到一八〇一年起鈔票對現金纔有貼水的現象；這種貼水逐漸增加，達到一八一〇年達到百分之二十，一八一三與一八一四達到百分之三十乃至百分之四十。不過在戰爭停止和平恢復以後，這貼水率便馬上很快地跌落下去了。關於該次英格蘭銀行流轉

不靈的原因，曾有過長期的討論與研究，但是沒有滿意的結果，因為各個不同的時期是有各個不同的原因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很可靠是在於英格蘭銀行供應政府，負擔太重，一八一四年達到二千二百萬金鎊的最高峯。另一原因大概是在於因為戰爭目的而不斷地支出款項於外國，但同時沒有相符的資金輸入以爲抵銷。

一八一九年公布了在一八二三年開始鈔票兌現的消息，於是自一八二一年起鈔票貼水的行市就完全絕跡了。(三)一七九三至一八一五年間英國的戰費總額按照希懋勒 (Schmoller) 的估計共爲八萬萬三千萬金鎊 (一百六十六萬萬金馬克)；每年的支出自一七九二年的二千萬鎊起逐漸增加到一八一四年的一萬萬九千六百萬鎊。大部分的戰費是取之於國債；因此在戰爭停止的時候，英國的國債增加到九萬萬鎊 (一百八十萬萬馬克) 的總額；迄該時爲止，這是空前最大的國債，任何國家也比不上。此外英國曾經由租稅的途徑一次所得三萬萬三千鎊 (六十

(三) Wolter, J.: Das Staatliche Geldwesen Englands zur Zeit der Bankenrestriktion, 1797

六萬萬馬克)的款額，即約當總戰費的三分之一。租稅的來源是所得稅，即是當時所稱的「戰稅」。在七年戰爭的時候，英政府曾津貼大陸上共同作戰的國家，在此次二十三年的戰爭中英國又會照樣津貼過大陸國家；因為英國理財有道，英國也確曾有此能力。自一七九三至一八一六年中總計約有六千萬鎊津貼流入歐陸，其中一千二百萬鎊助奧，五百七十五萬鎊助普，九百五十萬鎊助俄；僅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間，津貼之數已需約一千五百萬鎊，其中約一千一百萬鎊係津貼大國者。英國會對於此項戰債之全部償本付息，但僅收回到約一千萬鎊。(四)

### (三) 奧國

奧國和法國一樣，在這長期的耗財的戰爭中也不得不遵循發鈔的途徑。不過奧國的財政是比較地管理有序，正常的收入並不受發鈔的影響，所以發鈔的措施對於財政，尚無大礙。政府發行所謂的「銀行票」(Banknoten)；這銀行票原來是維也納市銀行的鈔票，可以在一切銀行兌現，所以該票會得長時期與現金同樣通行。雖是自一七九八年以來政府會發行鉅額的此項銀行

(Erd) 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Jena 1925, S. 62.

票，其價值仍能若干年繼續維持，不發生折扣的現象，因為政府既強迫其照法價流用而國家信用又尚未發生動搖的原故。不過自一八〇五年以後情形是變更了，特別是因為戰事不利的關係，銀行票的行市不久竟跌落到原來價值的五分之一。(五)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日經由內廷大臣瓦利斯 (Wallis) 伯爵之建議而頒佈的財政法令實明白地表示了當時的金融情形。該法令將市面流通的十萬萬六千一百萬的佛羅林 (結爾盾的別名) 減值為五分之一，另行發行二萬萬零八十七萬的新幣，即所謂的「兌現票」(Einkaufsscheine) 代之。不過在這貶價的措施尙未完全實施以前，新的戰爭 (自一八一三起) 費用已經又強迫着再度增加國債，以至到了一八一六年全部國債包括舊債在內竟達到六萬萬七千八百八十萬佛羅林了。奧國在戰爭開始前，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年間有基金的公債共為三萬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佛羅林，一八一〇年同債總額增加到六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佛羅林，其利息則經由前述的財政法令減低一半，迄於巴黎媾和為止。(六) 所以倘使沒有英國的津貼，奧國大概不能有力參加解放戰爭的。

#### (四) 俄國

俄國所經過的程序大體上與奧國相同。俄國的國債，在女皇喀德琳臨終時，總額為三千五百四十萬盧布，在保羅皇統治終結一八〇一年時，共增加到五千三百五十萬盧布。(七) 所以亞歷山大皇一世在一八〇五年以及一八〇六——〇七年應付戰時的財政，不得不以發行紙幣為唯一的辦法。本來紙幣自一七六九年以來，流通數量即日見增加，一八〇五年其價值約當金幣百分之八一·四；因為發鈔太多的關係，一八一〇年乃跌到百分之二十九。同年斯派郎斯基 (Speransky)

(八) 伯爵所建議實行的貨幣改革，以銀幣為本位，未能得有效的結果，在其後數年中紙幣的價值始終未能超出其面價的七分之二。(八) 一八一二年戰爭開始，帝俄的財政狀況至為惡劣，頗有人憂心其財政的崩潰。出賣國有土地的一部，得款用以從事緊縮在流通中的紙幣數量；這嘗試是失

(七) Hofmann, Dr. Viktor: Die Devaluier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Papiergeldes im Jahre 1811, München und Leipzig 1928.

(八) Russian Public Finance during the War, New Haven 1928,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Russische Serie), Apostol: Credit Operations, S, 284

(九) Dasselbe, Bernatzky: Monetary Policy, S, 338

敗了。倒是人民因爲受了「大軍」入境的壓迫，踴躍地自動捐輸一萬萬盧布，這樣，一八一二年國家對於軍費的負擔纔只有一萬萬六千萬，而這數目的大部分又是由發行紙幣去供應的。此後在德國在法國繼續作戰是由英國津貼四千二百萬盧布。在戰爭期中爲使俄國的紙幣能在德境通用起見，曾在俄軍佔駐的德境各省設有兌換櫃。關於俄軍在普奧境內的食養是另有特別協訂，事後俄國爲此會償付一千六百萬盧布。(九)

#### (五) 普魯士

前面已經說過，斐列威廉二世曾嘗試仿效斐列大王的辦法，供應其戰時的財政。他曾遺下四千八百萬托勒的國債，其中二千八百萬托勒是爲了戰爭而支出的。不過普魯士這筆國債，若與當時其他各國的國債相較，總還算是好的。斐列威廉三世至一八〇六年爲止會償付了七百萬托勒的國債並且又集成了一千三百萬托勒國庫儲金。一八〇五年動員共費六百三十萬托勒，其中二百萬係取自國庫儲金。此外爲預先綢繆一八〇六年年初作戰起見，另行發行「庫券」五百萬托

勒。普魯士發行紙幣這是第一次。鑒於法國發行紙幣的經驗不甚良好，於是當時規定流通的庫券的總數即以既經發行之數爲限，並指定若干銀行對於該券隨時兌現。最後並且更規定繳納租稅，王家出納處所以受取稅額四分之一的庫券，不須按向例全部繳納現銀。此外另鑄新輔幣一千八百萬托勒，就中國家獲利六百萬托勒。

一八〇五——〇六作戰所需的戰費似乎是足用了。但是在戰敗以後，環境至爲惡劣，確實地計算，事不可能；據可靠的估計，拿破崙曾自普魯士徵取了十五萬萬金馬克之多。疆土是削小到剩了原來的一半，而所負擔的國債則達到四千四百萬托勒，包括割讓區域中從前所發的充斥的輔幣在內。其時國債的利息都付不出；另外發行一種可以出讓的利息券爲代替品，稍稍救濟一般困苦。的債券所有人。戰時積欠的公務員薪給則發給可出讓的薪給券和庫券。庫券的行市在一八〇八年達到了最低點，合其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七。一八〇九年乃違背了原來所抱的原則續發二百萬托勒的小額庫券。其後財政已漸有復返軌道的趨勢，可是又因爲拿破崙進攻俄國的關係，完全摧毀了拿破崙的軍隊通過德境，普魯士要負供給食糧的義務。一八一二年普魯士在戰爭中的損

失估計約有三萬萬〇九百萬托勒。其時國債增加了七千七百萬托勒，一部分是在荷蘭發行，另一部分是在本國發行的。此項債款並以國有公地為擔保。此外政府實施了財產稅（任何財產均應繳納其價值之百分之三）所得稅（一切所得繳納百分之十）並且在徵稅以前事先發行庫券，准以該券繳稅，藉以提前應用預計的稅收收入。庫券行市本來在一九一一年已經漲到百分之九一，一九一二跌到百分之三八，可是在拿破崙敗績以後，又漲回到百分之五六。

一八一三年政府規定庫券的法定行市強迫通行，並計劃續發庫券增加其總額達一千萬托勒。因為人民肯犧牲，商人貸放現款，故未續發庫券。其時普魯士為促進軍備起見，曾將全境分為四個軍事行政區，各區自動接受了不少的強迫公債。在聯軍敗挫，退回艾爾拜河（Elbe）時，庫券會跌到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在萊勃茨希之戰以後，則又漲到百分之九十九。（十）英國的津貼對於普魯士的國民經濟有斷然的重要，其為金銀貨幣形式之津貼者，則此種貨幣之支出，即為增加的購買力，因士兵的薪給以及軍需的支出都足以強烈地推動經濟生活的。而因此而增益的收入，

多少又可以再爲稅源；不過尤其重要的，則是此種現金的津貼使普魯士國內公債能得到更多的貸放資本；其時普魯士的戰費大部分自然是要靠此項公債維持的。(十一)普魯士的國債在解放戰爭告終時共增加到二萬萬三千萬托勒。

#### (六) 美國

新英格蘭殖民地宣告與不列顛的母國脫離關係，這雖說與法國革命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新成立的北美合衆國當時所處的境地則頗與法國的革命政府有相像之處。爲供應戰爭的費用起見，在發行紙幣而外也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紙幣在數年以後也會有極度的貶值，一七八一年會由政府以其面值之二十分之一用有息的國庫證券易回。該項證券則於一七八九年財務卿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舉行美國國債大整理時併入國債。美國在這一點上並未有什麼大的損失，因爲當其與英國媾和時，曾獲得大片的土地，這種土地在此後和平年間對於美國頗爲有利。(十二)

(十一) Prion: Die Finanziellen Folgen, 前揭 S. 9.

二 解放戰爭時代

一八一二——一四年美國雖會助法參戰，然而財政上則未有任何重大問題，因為在美洲方面的戰爭，是至不緊張的。

(七) 結果

解放戰爭告終以後，法國戰敗，一般都以為該國是「人財兩竭」。在巴黎媾和的時候，以及在亞亨 (Aachen-Aix-la-chapelle) 公會席上，各國議定，法國繳清十七萬萬佛郎，聯軍便可撤兵。當時各國原以為法國短期之內，絕不能清償此項鉅款，撤兵自然是談不到。可是法國竟於三年之內陸續付清，完成了撤兵的願望。其時一般利率雖見升高，但未足以影響法國經濟的回復。和會所加於法國的負擔並未足以危害法國國內國外的市場。一半係出自於其本國，而另一半則出於英國的贊助。法國經濟回復的證據，可以自其五釐公債見之，其時法國雖說負有很重的「賠款」，可是在拿破崙崩潰以後的第七年，其行市即已能超出法蘭西帝國時代的行市，再一年以後達到其類

(十一) Breck, Samuel: "The Paper Mone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Band 20(1926), S. 121 ff.

面價格了。英外交部的和平便覽 (Peace Handbook) 曾以爲一八一五年的和約實使歐洲趨於政治的協調。(十三) 實則自財政的觀點來講，同樣也可以有這樣的論斷的。

(十三) Simon, Dr. Hugo, Ferdinand: *Reparation and Wiederaufbau*, Berlin 1925, S. 10ff.

###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

(重心移向於戰時借款)

#### (一) 英國

前文已經說過，在解放戰爭告終的時候，英國共有有擔保國債八萬萬一千六百三十萬鎊，無擔保國債五千七百九十四萬，每年付息約需三千一百五十八萬鎊。在戰爭告終以後，作為戰時稅而施行的一般所得稅又因為不符人心而被取消了，一直等到一八四二年纔再度施行。因此，這龐大的國債一時頗不易消滅；一直到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也不過纔減少了五千六百萬鎊，這也不過纔減輕了四百四十九萬鎊的債息，而其時的債息差不多占了全國度支的半額。接着克里米亞戰爭耗費了六千七百七十萬鎊；鎮壓印度叛變又耗費了不少，於是國債便又增加到八萬萬三千八百萬鎊。這筆國債到了東非洲布能（Buen）戰爭時已經減低到六萬萬二千七百五十萬鎊。可

是布能戰爭又耗費了二萬萬一千一百萬鎊，因而國債在一九〇三年又增加到七萬萬七千零八十萬鎊，後來一直到一九一四年纔減少到七萬萬零六百二十萬鎊（一百四十一萬萬二千萬金馬克）。這樣，英國的國債較之於一百年前差不多要減少掉二萬萬鎊；若以人口平均每人負擔國債計算，百年前每人負擔九百馬克，而當時每人只負擔三百四十三馬克，同時還應當注意到英國的國民收入已由百年前的五六十萬萬馬克增加三百六十萬萬乃至四百萬萬馬克了。

從英國的歷史上可以看出兩個基則。一是在平時力求把公債減少到最低的限度，以增作戰的活動性，就是說，預留在戰時發行公債的餘地。一是利用租稅的運用，在戰時增加稅率。英國的所得稅規定一百五十鎊以上的收入便須納稅，一八四九——一八五三年稅率是百分之二·九，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則增加到百分之六又三分之二。此外對於次要的不一定是必要的大宗消費品，如茶、煙草、啤酒、燒酒等等，亦設法加以較重的賦稅。一般講來，其時英國總求在賦稅的途徑上取得戰費金額的三分之一；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曾經由賦稅取得了全戰費的百分之五十三，而在布能戰爭時亦有百分之三十二·五。（二）

在考慮英國的戰爭活動性的時候，應當不要蔑視掉英國的貨幣制度，自從一八一六年以來即建築在金本位的原則上的，而且英國統治着世界上重要的產金地，在澳洲在南非洲，因而其貨幣制度的功效在十九世紀的諸戰中會能有很鞏固的施展。此所以像大陸上諸國積儲現金的辦法，在英國亦不需要。不僅此也，英國甚且可以貸放短期的隨時可以收回的（通知）貸款給外國——這可以算是一種有息的戰爭準備金——而在這種貸放上則尤其歡迎放與海外的原料品國家：所以在一九一四年英國有五萬萬馬克的此種短期放款放在美國，這筆款項用以應付動員時期海陸軍費是綽乎有餘的。英國慣於使用支票和紙幣，所以特殊的措施以求維護金的存量實是多餘之舉。及至一九〇七年美國金融恐慌把英國也捲入了漩渦，英格蘭銀行存金大大地受了影響的時候，法蘭西銀行曾以大量的美國金幣，貼現英國上等的信用票，給與英國大大的援助；（二）法國政府其所以給予法蘭西銀行便利，任其援助英格蘭銀行者，其背後是有政治的諒解的。

(1) Priori: Steuer- und Anleihepolitik Englands während des Krieges, Berlin 1918, S. 28.

(1) Schunacher, Hermann: Weltwirtschaftliche Studien, Leipzig 1911, S. 48.

而這種政治的諒解則是無疑由金融鉅子，尤其是由倫敦巴黎兩地的羅特歇爾德銀行（Rothschild，IIa）所促成。（三）其時在英吉利海峽的兩方都有相同的趨求，求其投放於外國的資本在歐陸發生戰爭時能有安全的保障。英王愛德華會再三嘗試使奧國佛朗茨約瑟夫帝與其聯盟國脫離，這其間大概也有羅特歇爾德財閥在慫恿，因為羅特歇爾德財系在維也納也有分行，一旦歐洲發生戰爭，自然也不願目睹該分行陷于敵人的營壘之中的。至於在倫敦與紐約之間，則有聞名的「金的電纜」（das goldene Kabel）的關係，而這金纜的關係，雖經獨立戰爭和美國內戰亦未中斷；一面是富裕的債權國，一面是蒸蒸日上債務國，其間好像是有不成文的金融同盟，以至德國信以為在這兩個盎格羅薩克遜國家之間是有祕密的交互保險契約的。海爾飛利希（Hefferich）估計英國的國富有二千三百乃至二千六百萬金馬克，或平均每人五千一百乃至五千八百馬克；（四）其中除掉一千二百萬馬克的有價證券而外，共有八百萬馬克是投放於海外的，而在

(III) Corti, Conte E. O.: Das Hans Rothschild in der Zeit seiner Blüte, Leipzig 1928,

(IV) Hefferich: 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Berlin 1917, S. 116.

一九一三年投放於海外的資本的百分之三十九是在美國，只有百分之五在歐陸；德國在解放戰爭以後，本來是英國資本的主要活動地，可是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幾乎可以說英國的資本在德國是毫無興趣了。

### (二) 法國

論到法國的財政上的戰爭準備性，有若干因素是極為重要，第一法國在地理上有一個天然統一的空間，易於防禦；第二自從路易十一世以來，法國即已趨向於統一的國家機構，這是比之於德意早四百年的發展，終則經由革命的關係，財富的分配有了相當的調整，造成了一個廣大的中產階級。(一)正因為經由歷代的戰爭獲得了政治上的統一和國民財富上的均衡，所以國家的體制雖屢有變遷，而貨幣制度與國家財政都能適應平時與戰時的財政需要。一直等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〇一——一四），法國傾心於其霸權的競爭，不吝耗費國帑，其時雖有踴躍熱忱

(1) Kjelken = Hanshofer: Die Grossmächte vor und nach dem Weltkrieg, Leipzig und Berlin 1930, S. 64 ff.

的捐輸，然而直接的賦稅負擔，依舊甚重，只纔發生了爭議，究竟以租稅供應戰時財政，與以借款供應戰時財政，二者孰佳。待到一七八九年革命，法國的舊時租稅系統是全部崩潰了。鑒於平等原則的要求，舉凡前此優待某種階級的辦法是完全掃除了，而對於有轉嫁性質的間接稅亦力求加以種種限制。因此另行造成了五大項的產益稅（Einkommensteuern），土地稅，專利稅，資本收益稅（Kapitalertragsteuer），動產稅（Personal mobiliarsteuer），房屋稅（Tür- und Fenstersteuer，門牖稅）。這種稅收都是由官廳估定，大都與實際產益不符。因為法國的民情，與按照產益簿冊自動估稅的辦法，不能適合，故爾經過了多年遷延以後，終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頒佈法令實施直接的所得稅；不過因為估稅的方法不甚完善，而稅率又甚低小，所以稅收並不甚大。（二）

法國的陳舊的租稅制度在戰時雖說不堪應用，不足與英國相較，然而法國的募債政策則有特殊的傳統的成效。（三）在解放戰爭告終時，法國的國債約共十二萬萬五千萬法郎。此後直至一

(1) Vogel, Dr. Emanuel: Die Direkten Steuern Frankreichs und Ihre Reform, Finanzarchiv, 81. Jahrgang (1914), S. 497 ff.

八四八年間是受了羅特歇爾德財系和平主義的影響，至爲明顯，因爲其時羅氏財系方在鼎盛時期，惟恐其營業受戰爭的威逼的，(四) 路易十八時代國債的增加是與戰爭賠款有連帶關係的；至於路易費利勃 (Louis Philipp) 所增募的六萬萬法郎則係爲公共建築之用。

在第二帝國成立的時候，國債一共是四十六萬萬二千萬法郎，每年付息需二萬萬三千一百萬法郎。政府的擴張計劃其時是由中央發鈔銀行與金融界鉅子共同維持的。羅特歇爾德財系其所以贊助克里米亞戰爭的原因，據說是與俄皇反對猶太人有關。上文已經說過，英國的戰費大體上是經由增加租稅而籌劃的，可是法國的十六萬萬六千萬法郎戰費則幾乎完全是經由借款而供應的；一八五九年法國參加意大利戰爭，共費三萬萬七千五百萬法郎也幾乎同樣是完全得之於借款的途徑。(五) 羅特歇爾德銀行在一切國債的發行上都有獨家承辦之權。在克里米亞戰爭

(四) Gerloff, Dr. W.: Kriegsanleihen im 19. Jahrhundert, Bankarchiv, 14, Jahrgang 1914-15), S. 192 ff.

(五) Corti: Der Aufstieg des Hauses Rothschild, Leipzig 1927.

(六) Ludwig, a.a.o., S. 928

以後，法國新興了若干股份銀行，共同聯合起來擁護拿破崙三世的戰爭政策，於是羅特歇爾德銀行的獨占權是破裂了。同時在這期間，法國的國債總額增加到九十一萬萬七千萬法郎，在一八七〇年德法戰爭的時候，更增加到一百三十七萬萬九千萬法郎。法國人民的儲蓄力是至為龐大，應募是很踴躍，每有公債發行，都甚易得款；而儲蓄人也多半將其儲款投放於公債，所以公債乃成了法國中小儲蓄人的財產的主要部分。

自德法戰爭告終起至世界大戰爆發為止可以說是第三時期，在這期間軍費增加，極為顯著，一八七五年的國防費是七萬萬法郎，一九一四年則增加到十八萬萬一千五百萬法郎。專門因為這國防費增加而新添發的國債共達三百三十六萬萬法郎。(六)公債的息金也同樣增加了，曾經屢次成功地另發三釐新債抵換；付息所需的款額在一八七〇年共為五萬萬二千二百萬法郎，而一九一二年則增加到九萬萬六千一百萬法郎，實佔了全歲出的四分之一。

(六) Schwarz: Die Finanzen der europäischen und wichtigeren Ausereuropäischen Staaten, Finanzarchiv, 32, Jahrgang (1916), S. 167 ff.

在十世紀初年，帝國主義的發展是到處活躍，不過在法國則另有其發動的方式：因為其時法國的人口固然不見增加，而工業又不若他國進步迅速，所以法國特別顯著的帝國主義膨脹的方式，是接受外債。緣來巴黎交易所，不得政府的同意是不能對於任何外債開盤，所以超出本國需求以外的國民儲蓄，如果要對外投放是完全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的；於是放款的資本乃成了法政府的「第五武器」(Fünftes Waſſer)。(七)就在這種環境之下，並不須有金融鉅子們的特殊心願，法國會有鉅額款項貸與俄國，終至法國的對外政策深陷於俄國的困難之中，牢不可拔。在意大利要求貸款的時候，法國會要求其允諾中立，三國同盟即係因此而見鬆懈。一個法國的統計估算一九〇八年法國人民領有外國公債三百八十四萬法郎。其中有一百一十萬萬是俄國的，三十六萬萬是奧匈的，三十萬萬是埃及的，還有二十五萬萬土耳其的，荷蘭、瑞典、意大利與葡萄牙各約十四萬萬，英比各約十二萬萬，五千萬，阿根廷、巴爾幹諸國全體，與西班牙各約十萬萬。(八)在大戰

(十) Kjellen = Haushofer, 前譯 六二頁

(八) Hartung, H.: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Finanzielle Lage Frankreichs und der Kriege, Bankarchiv, 14, Jahrgang, S. 111.

開始時，法國共有外國公債五百萬萬法郎（約四百萬萬金馬克），而全體有價證券則爲一千二百五十萬萬法郎（約一千萬萬金馬克）（九）

雖說世界各國其時大都曾爲法國的債務國，然而在德國，法國是始終沒有投放過可觀的長期借款。德國工業需要資本雖說很緊急，以至不得不出高利求貸，然而法國所貸，大都是短期貸款，不過總額也有相當的大罷了。密開爾（Dr. Miquel）部長在一八九八年估計法國投放於德國交易票之數約在二萬萬至三萬萬馬克之間。（十）在本世紀的初年曾增加若干倍，不久因爲摩洛哥事件（一九一一年）法金融機關受了政府的暗示立刻從德國撤回短期放款約十萬萬馬克，此後在德國即不復再有鉅額的投放了。（十一）

至一九一三年爲止，法國的歲計實際收入雖說往往超過預算以上，然而摩洛哥事件增加軍

（九）Prion: Der Internationale Geld- und Kapitalmarkt nach dem Kriege, München und Leipzig 1918, S. 14.

（十）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Anlagenband S. 303.

（十一）Helfferich, Karl: Deutschlands Volkswirtschaft, Berlin 1914, S. 115.

備，以及三年服兵役制的施行，在在需款，使國家的財政，不另闢新的途徑，不足以應付。因此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七日曾發行三釐半公債共八萬萬零五百萬法郎，該公債雖說認募人應募超出實額四十倍，然據稱實在收款並未足數。

按照最近泰萊氏 (Edmond Thierry) 的估計，法國的國富在一九〇八年共爲二千八百七十萬萬法郎（二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而一八九二年只有二千四百三十萬萬法郎（二千〇八萬萬馬克）。所以若以人口計算，一九〇八年法國平均每人有財產七千三百一十四法郎（五千九百二十四馬克）。法國國民的財富狀況雖說很好，然而其一般經濟情形並不甚滿意，因爲其時的農業收成是極不好，而一般景氣則更是在沉滯之中。自一九一四年初起，資金市場上的不佳象徵是日益明顯了；巴爾幹戰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間接的不良的後果，甚且美國在巴西、阿根廷所投放的鐵路投資，因爲金融緊迫的關係而發生危機，因而美國亦感覺到恐慌，於是會使許多的外國債券惡化，法國受損甚大。法國有鉅額金融投資的俄國，經濟生活上也發現了裂痕。（十二）前此俄國政府向例是把自法國取得的借款存放於法國大金融機關，可是一九一四年一

月俄國政府把巴黎的存款悉數提淨。於是法國的金融機關其時如果不自行設法，在法國交易所中便無法維持俄國的債票。不過其時的環境是不甚容許法國的銀行從事這種維持的辦法的，因為其時各大銀行投放於外國債券的資金是為數太大了。一般人民對於銀行信用的安全已經發生了懷疑。一九一四年五月發生了向一般會社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擠提存款的風潮，最後以至各大銀行不得不趨向於請求法蘭西銀行審查外國債券的一途。雖說法蘭西銀行會一再聲明，安穩人心，而巴黎交易所裏面，外國債券仍舊反映着慘跌的行市。正在有人開始懷疑：如果行市繼續下落，一定會有強迫行市的一天，歐戰是忽然爆發了，歐戰對於這一般人可謂來得適逢其會了。

在考慮法蘭西銀行與法國政府間的關係的時候，應當注意到法蘭西銀行實是戰爭的產兒。該行係於一八〇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設立，是拿破崙就任終身執政（*Lebenslänglicher Konsul*）

(十一) Schwarz: Die Finanzen der Europäischen und Wichtigeren Aussereuropäischen

Staaten, Finanzarchiv, 38, Jahrgang (1916), S. 301 ff.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

三七

的最先措施之一。爲求其有發鈔的優先權起見，最先任其在巴黎獨佔發鈔，繼則更任其在外省亦得獨佔發鈔。更爲求其充分地受戰時需要的調度起見，一八〇六年頒佈法令，規定其職員應由皇帝任命。其時法國用武頻繁，而財政的需求，也格外緊急，因而法蘭西銀行常有不能付款的時候，尤其一八〇五年和一八一四年。在拿破崙下臺以後，乃不得自行創立起獨立的地位，徐緩而鎮靜地克服那因長期戰爭而造成的金融恐慌。（十三）

在二次帝國成立以後，法蘭西銀行對於一切戰爭，無不竭力贊助，尤其在一八七〇年曾以其迅速周詳的措置，避免了法國當時威逼着的經濟的和財政的崩潰。（十四）在戰爭失敗之後，該行即設法收兌其前此所發鈔幣，名義上是自一八七八年起，而實際上自一八七四年起，即已開始收兌了。同時根據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五日的拉丁國家貨幣同盟的規定，停止鑄造銀幣，所以實際上

〔十三〕Jaffé, E.: Das Englisch = Amerikanische und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 im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e, V, Abt., II, Teil, S, 214 ff.

〔十四〕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S, 422.

自該時起，即已渡入金本位制了。但其時的存銀並未拋出，這是對於戰爭的準備性有很大的意義。因爲在戰時，度支方式不同，通貨的流通速率減緩，需要硬幣支出的地方是較甚於平時的。此外法蘭西銀行的鈔幣有法幣的效力，隨時可以以二十法郎五法郎小額的紙幣發行，隨後再行逐漸收回。鑒於在金融恐慌的時候，現金集中存儲，有許多利益，於是政府核准法蘭西銀行，有權對於兌取現金者徵取百分之一的貼水，因而法蘭西銀行比之於德國的國家銀行，能保有更大的銀金集中。此外法國政府與法蘭西銀行訂有祕密條款，在法蘭西銀行每次請求設立特許狀時總要重新續訂（最後一次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按照該條款，在戰時法蘭西銀行負有義務，供給海陸軍動員所需之款，而法蘭西銀行則有權停止兌現。再則法政府與阿爾幾銀行（Bank von Algier）也訂有同樣的條款，該行負責的款額爲一萬萬法郎。（十五）法蘭西銀行的存金量在一九〇四年已經達到二十五萬萬法郎，自此以後更經有計劃的增加，所以一九一四年七月達到四十一萬萬

（十五）Truchy, Henry: Les Finances de Guerre de la France, Paris 1920, Wirtschaft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Französische Serie, S, 43.

四千萬，此外尚有六萬萬四千萬法郎的銀幣。(十六)其時法蘭西銀行的地位是至爲順當優益，法國政府深信其戰爭準備性在財政上是很有把握，至於一般信用銀行有缺點的地方，是可以置而不問的。至於經濟上的戰爭，則認爲不成嚴重問題，因爲如果同盟的英國參戰，英國會保持海上的自由交通，並且在窘急的時候，英國可以負擔戰時財政的主要部分的。

### (三) 俄國

俄國的國債在解放戰爭告終時，總數若干，無可稽考，不過一般估計起來，大概不至十分超過一八〇一年的總額五千三百五十萬盧布。其後因爲一八二八——二九年的土耳其戰爭耗費了二萬萬七千二百萬盧布，鎮壓波蘭叛變耗費了一萬萬一千八百萬盧布，所以到了一八三二年國債的總額乃增加到二萬萬一千三百萬盧布。在克里米亞戰爭開始的時候，俄國有擔保的國債共計七萬萬三千二百萬盧布，在亞歷山大二世革新政治開始的時候增加到十二萬萬六千萬盧布。

(十六) Jöhlinger: Die Finanzwirtschaft unserer Gegner Während des Krieges, Finanzarchiv,

34. Jahrgang (1917), S. 42 ff.

其後土地改革所需的徵地償款使國債愈見增加，等到一八七七——七八年俄土戰爭爆發時已經增加到二十九萬盧布。俄土戰爭又耗費了十萬萬零二千萬盧布。在戰爭時期以及在結束戰爭的時候，不得已曾發行十五萬萬盧布的公債。其後有維泰改革（Wittesche Reformen）需款，國債又見增加，在日俄戰爭時代總數達到六十七萬萬盧布。日俄戰爭共費二十三萬萬盧布；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國債總額達九〇萬萬盧布。在歐戰開始時俄國有擔保公債總額為八十八萬萬一千一百萬盧布（一百九十萬萬三千二百萬馬克）。帝俄政府計自女皇喀托鄰二世起迄歐戰時爲止，即一百五十年間，共發行公債一百五十萬萬盧布，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曾經償清。（一）

從俄國國債增加的經過中可以看出，公債不過在最後的五十年間纔有重要的地位；俄國沒有可靠的稅源，所以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爲止，一切戰爭所需大都是以發行紙幣爲助的。在解放戰爭以後財相康克林伯爵（Trauf v. Kunkrin）力求穩定貨幣，規定紙幣三盧布半合銀盧布一枚，並另發新兌現紙幣收回舊紙幣，新紙幣自一八四三年起稱爲信用票（Kreditbillet），自一八三

(1) Apostol, Paul N., a. a. O.

九年至一八五四年間，俄國銀本位的幣制確是很穩定。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時候，俄國有銀存量一萬萬六千一百萬盧布，約當三萬萬三千三百四十萬紙盧布的半額準備金。在戰爭期間，紙幣流通數約增加一倍（一八五七年，達七萬萬三千五百萬盧布），於是不得不再度取消兌現。一八六〇年仿效西歐各國的榜樣設立帝俄銀行，以爲中央發鈔銀行，並在英國取得借款，鞏固存銀，復求兌現。一八六三年進行兌現的初度嘗試，結果是失敗了；等到一千八百七十年間財相萊烏透伯爵（Gruf. von Reutern）曾準備實行金本位制；不過這一嘗試又是擱淺了，因爲政府未能使交易界深信金條款的必要。一八七七——七八年的俄土戰爭再度使發鈔大增，總計所發約在四萬萬盧布以上，鈔幣流通的全額達九萬萬五千九百七十萬盧布。盧布受此次戰爭的影響太深，一直等到維秦伯爵自一八九三年起實施了若干嚴厲措施應付國際的投機，這纔能穩定起來。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帝俄銀行並未有停止兌現的必要。（二）反之，俄國準備充分，曾使其議和代表維秦伯爵感覺有鞏固的後盾，堅決拒絕日本的賠款要求。等到其後革命運動蓬勃，這纔發生了困難，貨幣

(1) Helfferich: Das Geld im Russisch-Japanischen Kriege, Berlin 1904.

平價是否能夠維持下去，其時曾一度發生疑問。在歐洲經濟界中，其時頗以為俄國不僅在軍事上，並且在財政上，也需要一長時期纔能強盛起來。(三)不過這種恐懼並未實現：帝俄銀行在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六日存金量即已有十二萬萬金盧布，其紙幣的準備百分數且為百分之一〇二。該行的存金量此後繼續增加，洎乎一九一四年七月乃達到十六萬萬金盧布（三十四萬萬五千萬馬克），實居列強各中央銀行存金量的首席。(四)這筆鉅額金準備的來源無疑是得力於其本國烏拉山與亞伯利亞的金礦出產。

俄政府為應付其特殊的國庫需要起見，如常常發現的款收，軍事的準備措施，以及戰爭所引起的需要等等，在中央銀行而外尚有一筆所謂的「帝國稅收局積存金」（Freier Barbestand der Russischen Reichsrentei）可供支用。這筆一般的準備金因受一九〇〇年日俄戰爭的影響

(三) Ungenannter Verfasser: Russlands finanzielle Erstickung, Vierteljahrshefte für Truppenführung und Heereskunde, x. Jahrgang (1913), S. 691 ff.

(四) 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S. 471.

響曾低減到二百萬盧布，可是在歐戰開始時則又增加到五萬萬盧布。該款大部存放於英美法各銀行，一小部分存放於德國各大銀行；而存放於德國的款額則於一九一四年七月間大部提出。這筆積存金的數字其所以能如此顯明地鉅大者，大體上是得之於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及一九一一年年的豐收。因為財相哥加夫索夫（Kokowow）調度得當，剩餘穀產，得免於賤價糶出，在外國市場上獲得極佳的行市。其時帝俄的財政大體取決於歷年的收穫；首相斯陶歷平（Stolypin）導行土地改革，一般希望此後財政不再受制於農產收穫。改革的計劃在於把原來的公有田地制下的公田分授與個別農民，這樣藉以增加農民本身利害關係，促其勤作儉用。如此求在若干年間得把當時在主要上建築於國家獨佔事業與間接稅上的租稅系統改革為直接租稅的體系，藉以求更有效地供應戰時的財政。（五）

雖說俄國的經濟，在工業上，在農業上，比之於中歐與西歐各國是落後甚遠，然而其一九一四

（五）比著 Pantlen: Russlands Wirtschaftliche Kriegswirtschaft bei Anbruch des Weltk-

rieges, in: Wissen und Wehr, 1932, S. 384.

年的發達程度，也就頗有可觀了，而那個發達的程度，要是沒有外國的鉅額借款，也是不能達到的。直至一八八七年俾斯麥禁止德意志銀行接收俄公債爲放款抵押品爲止，德國對於俄國亦同樣處於重要債權人的地位。自此以後，情形是大變了，即令其時一般流傳的意見，以爲這存心報復的禁止實使需款孔殷的俄國投入法國資金的懷抱，是有些言過其實。(六)在其後，法國變成了帝俄的主要貸款人，一般估計，如此至一九〇六年爲止流入俄國的貸款共有一百一十萬萬法郎（四十萬萬七千萬盧布）；俄國內債外債各有若干，沒有準確的統計可資考證，可是按照公債付息數字上的外內債的分配，亦可大約估計：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二年平均每年付息三萬萬九千五百萬盧布，其中用於內債的，平均每年二萬萬二千三百萬盧布，用於外債的爲一萬萬七千二百萬盧布；據此計算外債總額當在三十八萬萬之譜。(七)外債收入的一部分是用之於彌補歲計，大體上是供應軍備用的；約有百分之三十五是用之於建築鐵道。可是俄國鐵道網的建築，側重於軍事

(六) Ibhöken, Dr. Rudolf: Das Aussepolitische Problem Staat und Wirtschaft in der deutschen Reichspolitik 1886-1914, Schleswig 1928.  
(七) Apostol, Paul N. a. a. O.

策略的立場而不重視經濟的需求，所以俄國國營鐵道的收益性是至爲微薄，而且此外國家對於私營鐵道的借款，價本付息，亦負擔保的責任。(△)所以明眼人，在歐戰開始前即已見到，俄國國庫度支中，借款的負累太重，若干鉅額外債的息金償付，一部分是靠賤價出售穀產，一部分則靠借新債來償付。很明顯，帝俄不得外國金融財政的幫助，是無從參加歐戰的。

(四)奧匈

奧國的歲計向來不足，因此至一八六八年爲止一共發行了一百零一種公債。一八六八年合併爲統一的公債。自一八六七年起，奧匈歲計合併，其中最重要的支出要算海陸軍費；其來源出於奧匈兩邦的關稅與兩邦對於聯邦的捐輸。稅收的重心在於間接稅，對於戰時的財政是不甚適宜的。一千八百七十年間曾試行一般所得稅，但未得結果；一八九六年成立個人所得稅，但該稅並不爲獨立稅收，不過補充產益稅 (Ertungssteuern) 而已。

(△)Eheberg: Abschnitt Finanzen im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1927.

奧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在一八一五年媾和以後，即着手掃除充斥的紙幣，（至少可以說設法限制充斥的紙幣，）並且設法康復通貨制度。爲了後一目的於是有奧國國家銀行的設立，該行負責另發兌現的紙幣代替前充斥的紙幣。至一八四七年止共計收回舊紙幣約七百五十萬佛羅林。一八四八年發生革命的騷動，國立銀行乃不得不再度停止兌現，以強迫的行市發行紙幣。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九年又重行恢復兌現。其時奧國方着手調整其自從解放戰爭以來的不良的紙幣境地，擬與德國締結貨幣公約，承諾不再以強迫行市發行紙幣，流通市面，並於兩年內實行兌現。不過對意戰爭，適於其時爆發，致其調整貨幣所需的資金，完全爲戰爭所吸收。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一日奧政府乃再度停止國家銀行兌現的義務，強迫的流通行市又出現了。同時銀行則預支一萬萬三千四百萬佛羅林與政府，以爲一筆二萬萬借款的預付款，而該公債則待到適當的時期再發行。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威尼斯與隆巴德（Venezien u. Lombarden）兩省徵收強迫借款七千五百萬佛羅林，該兩省受了極重的犧牲纔能湊齊。濫發紙幣的結果乃至行市日益慘落，現貨完全絕跡，各方都感覺到痛苦。原來規定以現金貨幣付稅的條規乃不得不於該年六月十一日

宣告取消，因為商務是完全停滯了，而紙幣對現貨的貼水則達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國庫處於極度艱窘的地位，因而如果能及早媾和，那是再合意沒有了，真可以說，財政艱窘實所以促成了締結和平。奧國方面總共耗去戰費二萬萬五千四百萬佛羅林。事後曾着手整理幣制，然以經濟情形不佳，影響稅收，結果是失敗了。所以一直到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爆發的時候，奧國的財政都沒有能完全恢復。

因為增加軍備需款，一八六六年五月乃以強迫的行市發行鈔幣一萬萬五千萬佛羅林，又另發行公債六千萬佛羅林，以國有公地為擔保。此外在威尼斯省又強徵一千二百萬古爾盾的公債和一種補充稅。這樣湊集起來卻好足以應付因動員而生的財政困難。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核准的二萬萬佛羅林公債結果沒有發得成，因而國民銀行不得不增發出六千萬佛羅林的紙幣。一八六六年八月發行九千萬佛羅林鈔幣和五千萬佛羅林的五釐公債。一八六六年七月十四日現幣對紙幣的行市漲到百分之一百四十。雖經延遲票據債務到期付款二月亦未能改善當時的境地。奧國在媾和時實已瀕於財政崩潰的境地。(一)

奧匈的軍備費在百分比上，在實支數字上，比之於其他大國均見落後；國家本身的發展並不能與其所屬各民族邦（Nationalstaaten）的經濟發展有相同的步驟，因為奧匈聯邦屬下的各小民族邦大都是處於反對聯邦本身的地位的。按照費萊（Dr. Fr. Fellner）的估計一九一九年奧國的國民財富共為一千二百六十五萬萬克隆（Kronen）（一千零七十萬萬金馬克）。（二）可是前此奧匈帝國的政策則充滿了濃厚的過去絕對專制時代的傳統，並未顧慮到新的情形。奧匈帝國雖說在原則上經由一八九二年八月二日的法令即已採取了金本位制，可是奧匈銀行支付金幣直至歐戰爆發時止亦未完全實現。（三）但是奧匈銀行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實在的現金存量是有十五萬萬九千萬克隆（十三萬萬五千萬金馬克），其中有十三萬萬克隆（十一萬萬金馬克）金及金匯票。不過在奧匈帝國的各邦中貨幣流通數量是不甚可觀的，所以奧匈

(1) Ludwig, a. a. O., S. 329.

(II) Sonderdruck aus der Wiener Zeitschrift "Die Industrie," Nr. 16, vom 16. Mai 1914

(III) Helfferich: Das Geld, Leipzig 1923, S. 158.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

的用金基礎，比之於其他各歐洲金融大國，是至為狹隘的。

### (五)意大利

意大利在建國的歷程上是很經過一番艱辛的；當其列身於大國之初，其國民經濟尚未發達，而其行政上亦負有嚴重的任務。在一八六一年創立統一帝國的時候，其發祥之地辟蒙 (Piemont) 卻好經過了一八五九年的戰爭。在開戰以前曾長期準備戰爭，所以在戰爭爆發的時候，辟蒙的財政狀況已經是受了很大的影響。在戰爭開始前不久，尙得發行了五千萬里拉 (Lire) 的公債。在戰爭開始後曾經由慣有的辦法向國家銀行借款三千萬里拉，於是國家銀行乃停止鈔幣兌現並為鈔幣強訂流通行市，此外又徵收百分之十的戰需稅，共得約一萬萬里拉。(一)

其後在一八六六年戰爭爆發的時候，事前已經有過了若干年歲出超過歲入。一八六六年五月議會核准，經由國家銀行發行公債二萬萬五千萬里拉，同時該行再度宣布停止兌現，發表強迫鈔幣行市。因為意大利人民不甚信任國庫鈔幣，按照其時的經驗似以發行銀行鈔票為較有效益。

(1) Indwiler, a. a. O., S. 321.

爲增加資源起見，同年七月七日沒收教會財產，不過這種財產是未能於短期內將其化爲流動的資金。其時並未在外國募集外債，因爲這種外債的條件是太不順利的，因爲對於在國內發行自由的公債是否有可靠的效果頗有疑問，於是乃發行強迫公債三萬萬五千萬里拉，九五實收，按財產分配。在媾和的後二日又在國家銀行發行公債二千八百萬里拉。此外意大利的戰費尙有四萬萬里拉有餘。(二)

一八六六年戰爭開始後，情形雖是很順利，然而財政上的困難，仍是不免，一直等到一千八百九十年間，有了新的順利的環境，這纔能逐漸克服了那些困難。在那些環境中佔一重要地位的要算意大利僑外人民匯還祖國的匯款。自一八九四年起有若干年未曾發行新公債；一九〇六年整理舊債，發行鉅額的調換公債 (Konversion)，總數約在七十五萬萬乃至八十七萬萬里拉之間，頗得一般的重視，成效頗佳。(三) 一九一〇年七月國債的總數約爲一百四十一萬萬里拉（一百

(1) Ludwig, a. a. O., S. 381.

(3) Eiseberg: Abschnitt Franzen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tswissenschaften. Anfl. Jena 1927, S. 71.

一十三萬萬金馬克，) 每年付息約需五萬萬零四百萬里拉；在這國債總額中有四萬萬一千八百萬是國家發行的紙幣。

意大利國家財政整理的結果，頗見成效，雖因特里波里 (Tripolis) 關係而與土耳其作戰，戰費浩大，然而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初期為止，戰爭所需完全是由積存剩餘款額供應的，並不需增加賦稅。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這纔根據法令發行四釐國庫券三萬萬里拉。該次戰爭計自一九一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底止共費五萬萬四千五百萬里拉。(四) 可是在這新征服的殖民地完全被佔領以前，是需要屯駐強大的軍隊的，耗費財力甚大，因此這次的殖民地征服對於一九一四年大戰的財政的戰爭準備性，影響至為不利。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意大利的國債總額為一百五十二萬萬八千一百萬里拉 (一百二十二萬萬金馬克) 根據美國銀行信託公司 (Die Amerikanische Bankers Trust Co.) 的估計，意大利的國民財富在大戰爆發時約為九百二十四萬萬金馬克。(五)

(四) Riesser: Finanzielle Kriegsbereitschaft und Kriegführung, Jena 1913, S. 17.

意大利在一八六五年加入拉丁貨幣同盟，但至大戰爆發為止，迄未能實行金本位；可是意大利的三家發鈔銀行，die Banco d'Italia（意大利銀行），der Banco di Napoli（拿破里銀行），及 der Banco di Sicilia（西西里銀行），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款量有十三萬萬零三百萬里拉（十萬萬四千二百萬金馬克）（六）爲數亦有可觀了。

（六）德國

普魯士在歷次鎮壓革命，反拿破崙戰爭中，比之於當時各大國，實是受創最甚。不過在十九世紀的前半世紀中曾有長時期的和平，因得康復。其時信用日益增高，而資本市場一般狀況亦甚好，所以一八三〇年能將五釐的公債改爲四釐，其後且改爲三釐半，這樣每年付息所需的款項乃得減少，原來每年需款六百四十萬托勒，一八四八年乃減少到四百三十五萬托勒。自一八五〇年起，國家的歲出明白地日益增加：陸軍費一八二〇年還不過二千二百萬托勒，一八六五年竟達到四

（五）Risk: The inter-ally debts, New York, Paris 1924, S. 289.

（六）Riosser, a. a. O., S. 112.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

千三百六十五萬托勒。國債在一八四九年底共爲一萬萬五千六百萬托勒，一八六五年達到二萬萬八千零八十萬托勒，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爲建築鐵道而興借的。(一)一八六四年與一八六六年的戰爭並未使國債增加。前文已經說過的國庫積存的二千一百萬托勒在一八六六年很快就耗盡；不過該款是足以使金融恐慌不在戰爭開始時馬上就發生的。因爲戰爭在開始後少數日期之內，卽已大致決定，所以隨後核發的六千萬托勒公債大體上是用爲重行充實國庫的戰時準備金。(二)普魯士計在一八六四年之戰費去一千八百七十萬托勒，一八六六年之戰費去六千八百三十萬托勒。

一八七〇年之戰，普魯士是北德同盟(Norddeutscher Bund)的領袖國，預先提出其國庫積存金三千萬托勒，供給軍需。該款卻好可以接到第一次借款。在賽當(Sadow)勝利以後，第二次的公債一部分已經能在英國發行。北德同盟的戰債一共二萬萬托勒，事後均曾以法國的賠款按

(一) Rheinberg, a. a. O., S. 62.

(二) Ludwig, a. a. O., S. 330.

照面價購回；而南德意志各邦的戰費也同樣還清，因而德國其時乃得以無債國的資格而列身於大國之林。這兩次戰爭的勝利是太迅速了，以致國會對於國防政策不甚能瞭解，反而各邦地方利害關係的問題倒成了國會興趣的中心點。馴至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劃分上忽視了重要的一點：中央政府爲宣戰媾和的唯一最高機構，非有大權操縱一切最易增加的歲收不可。雖說其後中央會能逐漸伸入直接徵稅的範圍中去，而一般所得稅亦在各邦中逐漸施行，可是一九一四年的時候統一的稅率尙未能完全施行，中央尙不能毫無問題地附加徵稅，而在附加徵稅時亦不能使各邦負擔完全均等。因爲這種原因，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德國中央的公債增加到四十九萬萬八千金馬克；此外各邦共負債有一百六十萬萬，各省市共負債七十五萬萬金馬克。各邦的公債大都是爲建設官營事業之用，其中以建築鐵道佔首要的地位；而各省市的公債據估計只有一半是爲建設此種官營事業之用。(三)按照希懋勒 (Gustav Schmoller) 的估計，一八九五年德國的國民財富共爲二千萬萬馬克，而海爾飛利希 (Helfferich) 根據較準確計算估計一九

(ii) Reichsarchiv: Kriegserheb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I. Band, S. 476.

一三年國民財富共爲三千一百萬馬克；按照後一數字計算平均每人財富爲四千六百五十馬克。海氏估計一九一三年的國民收入爲四百三十萬馬克。(四)

普魯士在解放戰爭以後在羅泰 (Rother) 財長時代曾經由羅特歌爾德的倫敦分號發行公債不過這種關係到了俾斯麥時代是不再繼續下去了。俾斯麥在其佛朗府時代(即爲德意志同盟會議代表時代)對於佛朗府 (Frankfurt) 羅特歌爾德分號的經理即已很冷淡，其後一八七〇年發行北德同盟公債的時候，俾氏是以普魯士邦銀行(即所謂的海貿社爲經發機關的)就是在確定北德同盟公債行市和確定法國賠款總額的時候，不萊希斐代 (Bleichroder) 的襄助工作也不過只限於求銀行專家的建議不致於妨害國家全體。同樣普魯士的傳統在可能範圍之內總力求避免牽涉到普魯士銀行(即是外匯采業銀行的後身)按照普魯士銀行 (die Preussische Bank) 的組織規程，其信用活動的範圍只以通常的情形爲限，所以在一八四八年發生恐慌的時候，爲應急起見，乃以該行爲基礎設立貸款出納處 (Darlehenskasse) 得接受有

(四) Hoffrich: 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Berlin 1917, S. 19 und S. 115.

價證券和機貨爲抵押發放貸款於私經濟經營，而其付款則另有一種「貸款出納券」(Darlehensauswechslungsschein)。普魯士的財長在舉行這種辦法的時候，是否是存心仿效解放戰爭時代的庫券則是無從確定；不過該券是在一切官家出納處所照面價通用的，因此有所謂的「出納處行市」(Kassenkurs)。這種貸款出納處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年均曾再度設立過，不過其貸款總額限度較爲提高而已（一八四八年爲一千萬托勒，一八六六年爲二千五百萬托勒，一八七〇年爲三千萬托勒）。這種貸款出納處是確有相當的效用。因爲按照普魯士銀行的組織規程，該行發行庫券的數量是至爲有限的，所以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〇年爲供應戰費起見，亦曾經由這種貸款出納處發行庫券，而且在普魯士與其他德意志各邦軍隊佔領的區域中本來是感覺通貨缺乏的，「貸款出納券」正好可以填補這缺乏，所以便是沒有強迫的「出納處行市」貸款出納券的行市亦無下落之虞。(五)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戰爭告終以後，一般狀況至爲順利，因而改行金本位制並統一各(五)Fenolwanger: Die Darlehenskassen des Deutschen Reichs, Stuttgart u. Berlin, 1928.

種紛雜的幣制。此後各工業國家，尤其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經濟發展至速，鐵道網的興築使百萬大軍的給養與維持均有可能，而新的技術亦日益深進。這樣強迫德國政府不能不預見到，在下次戰爭發生時，非放棄其原有的傳統，而將帝國銀行（Reichsbank）（全國銀行，中央銀行）首要上作為戰時銀行不可。求達到這種目的所施行的一切措施通常總稱為財政的動員，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財政的動員的程度達到了中央銀行存金十三萬萬七千一百萬馬克（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看來足以應付一個新時代戰爭的需求，此外則尚有二十萬萬馬克的存金存於私人的手中。（六）

### （七）美國

美國出於地理上的關係，沒有自外受襲的憂患，加以政府一向抱着自由主義的觀念，因而使美國一直到一千八百六十年間為止，對於任何軍事上的以及財政上的戰爭準備，都覺得沒有什麼重大的價值，於是在所謂「南北內戰」爆發的時候，乃不得不迫而採行不以現金為基礎的紙

幣經濟。自一八六一年起，紙幣流通的數量，日益增加，不過自一八六二年起曾以兌現的庫券按照法定的行市收兌了舊有的紙幣。紙幣的最大流通量，原來是訂爲一萬萬五千萬元的，在一八六四年乃增漲到四萬萬五千萬元；現金的貼水在一八六四年七月漲到最高點，達到百分之一八五；一年之後跌到百分之五十。戰爭的費用是太大了，因而合衆國的政府除增加賦稅而外，也不得不假道於借款的途徑了。倫敦與巴黎的金融界暗中是偏袒聯邦派，荷蘭的金融界則傾向不甚反此，羅特歇爾德財系則對合衆派表示親善，而俾斯麥則抱中立的態度，因而合衆國的債券在佛朗府交易所的行情自一八六三年起總很順利：這些債券其後在一八七〇——七一年戰爭的時候，大部會由美政府以優益的行市購回，這樣對於德國的貨幣穩定的確會幫忙不小。(一)在內戰告終以後，政府曾計劃清除紙幣，因爲強有力的利害關係方面反對，未能實現；不過一八七九年起即開始兌現，美國產金豐富，兌現的辦法乃得廣續維持。

(1) Stolberg, Dr., Otto Grafzu: 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m Zeitalter

Bismarcks, Berlin 1938, S. 97 ff.

合衆派的反對方，即南美諸州，自始即是以紙幣應付戰爭財政上的需要的，至一八六二年初爲止，軍事上有相當的勝利，紙幣行市尙能維持。可是在同年四月間貼水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一八六三年二月達百分之二百，同年底增加到百分之二千，終於一八六五年一月漲到百分之六千。不過此後更大的恐慌也未發生，因爲南美各州的經濟是建築於大地主與農奴制度之上，實物經濟有相當的通行，在一定範圍以內是可以放棄貨幣爲易牛的。在內戰告終南北媾和的時候，南方戰債總數達六萬萬元，合衆政府全部不予承認，南方發行的紙幣也成了不值一文的廢紙。(二)

南北內戰一共耗費掉美國三十五萬萬八千九百萬元。在一八六五年，即內戰告終的一年，國債總數增加到二十三萬萬八千一百萬元。幸而此後若干年中，高率關稅使國庫收入異常富裕，可以陸續償債，一八九一年國債總數乃低減到五萬萬八千五百萬元。在和平時期，海陸軍費爲數甚小，所以倘使不是在一八九八年與西班牙開戰耗費一萬萬五千七百萬元（六萬萬六千萬金馬克），美國的國債總數是會繼續低減的；就因爲這次戰爭的關係，在該年年底，國債又增加到十萬

(11) Nearing = Freeman: Dollar Diplomatie, Herliha 1927, p. 35.

萬四千六百萬元。等到一九〇七年纔復行減少到八萬萬九千四百萬元。其時又因出於戰略上的關係，續開巴拿馬運河，國債再度增加達到九萬萬七千三百萬元（四十萬萬八千六百萬金馬克）。美國在踏入歐洲時期的時候，國債的總數即大概如此。

美國的國民財富，一八五〇年估計爲七十萬萬元，一八七〇年也不過三百萬萬元；可是在一九〇〇年就約有八百八十萬萬元，及一九一四年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萬元（五千萬馬克）。換言之，平均每人有一千三百一十元（五千五百馬克）。（三）國民收入在一九一四年爲三百三十萬萬元（一千三百八十六萬馬克）。所以就國民財富而論，美國不爭地居於各大國的首位。美國的礦藏至爲豐富，所以經濟的興隆可以由本國以內的資源去造成。再則自上世紀的中期以還，歐洲移民向以美國爲目標，人口激增，亦係造成經濟興隆的要因之一。還有，歐洲各國，尤其英國與德國，對於美國企業，頗能儘量投資。在最初的發展時期，以國家舉行的借款爲多。然而此外美國私經營直接向歐洲金融市場求款，亦頗有成效，在戰前估計約有五十乃至六十萬萬元之譜，或則

(三) Helfferich: 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a.a.O., S. 116.

是投資於美國鐵道的債券，或則是投資於鋼鐵托辣斯與礦山經營的股票。

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引起了戰爭財政上的需要，其時會有大批的日本債券在歐美證券市場上推募，等到一九〇七年三月間，日本會清償一萬萬一千五百萬金元的公債，借款的半數原來是美國銀行貸出的。美國的金融界敢於參加國際大金融的場地，這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一九一一年美國投放於外國債券的資本，總額共有五萬萬元，分配於下列各國：加拿大一萬萬五千萬元，墨西哥一萬萬八千萬元，古巴五千萬元，其他拉丁美洲各國五千五百萬元，歐洲一千萬元，中國與日本五百萬元。美國隨後創起了抵押借款的系統，這樣便把它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加上了很明顯金元外交的色彩；這金元的外交是隨環境應變的，有純經濟的侵入的體系，如在加拿大，也有完全奴隸化的體系，如在十九爲印第安土人墾居的墨西哥是。（四）

先是在一七九一——一八一〇年間以及在一八一六——一八三六年間，曾先後兩度成立過一個美國銀行，不過後來都是因爲政治的原因而消滅掉了。自此以還，各州自行核許發鈔。等到

後來南北內戰引起了財政上的困難，這纔又成立一個統一的銀行制度，爲保證其新債券的交易市場起見，一八六三年聯邦政府頒佈一新銀行法，隨後在一八六四年一度更新乃成了最終的形式。按照該法，新成立的各「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要在國庫存放相當數量的聯邦債券纔能發鈔，不過這種辦法會使發鈔失去了伸縮性，阻礙了大量的中央準備金的產生。

在大戰爆發以前不久，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聯邦準備法案 (Federal Reserve Act) 另代美國的銀行體系造成了新的基礎，按照該法案全國分爲十二區，每區設聯邦準備銀行一所；而各聯邦準備銀行則受制於聯邦準備局。新制度的目的在於造成一強有力的中央銀行體系，爲各信用機關的後盾，使其能逐漸從那些日益惡化的純金融關係的影響中，從那些大資本案鐵道大王與投機分子的牽制中解放出來。不過這新制度遲延到大戰爆發以後的初期纔施行的。

(五)

#### (八) 日本

(H) Jaffé, a.a.O., S. 205.

三 迄於世界大戰以前

日本在取消幕府制度與開放閉關政策以後，爲求與政治和經濟的新秩序相符合見，財政系統也是要新創起來的。一面，舊日封建時代的國債是要繼承過來；一面農奴制度是取消了，而武士（侍）階級又需給資，這都使舊日的實物廩廉制度，非取消不可。爲了要以歐洲技術的費鉅的工具和武器供給新造成的經營與國防制度，於是不得不把舊日的實物經濟經過一度激烈的變遷，過度到貨幣經濟來；在這過渡的時候，自然是免不了騷動的，比如薩摩（Satsuma）變動便是與這激烈的改革有關，不過這過渡的改革畢竟是成功了。在財政困難的時期（即自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一年）終結的時候，日本共計流通紙幣一萬萬七千零十萬圓。按照當時日本的情形，這當然是異常鉅大的數字，其後果是反映於紙圓的跌價之上：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行市達到了最低點，計紙圓一·八五圓等於銀圓一圓。

自一千八百八十年間起，是爲日本的財政建設時期：經由酒稅加倍，設立關稅，出售企業經營與行政節省等一切的方法，國家的歲入是增加了，於是乃得整理一切舊日的高利公債，另發調換公債。這建設的時期，以至對中國戰爭爲止，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的國債總數共爲二萬萬八

千三百三十萬圓。

中日戰爭的費用共爲二萬萬三千五百萬圓；除一部分係以經常收入供應外，其餘則取給於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圓公債的發行。這筆戰費並不是虧本的支出，其後中國負責賠償戰款三萬萬六千五百萬圓，那自然是足補其失而有餘的了。這筆賠款對於日本經濟的促進頗有與法國賠款對於德國國民經濟所生的後果類似的地方：工業、航業與商業均曾有空前的躍進，又因同時適逢銀價下落，連帶日本的通貨價值下落，引起熱烈的投機，格外推進了工、航、商業的進步。一八九六年與一八九七年日本政府在議會提出範圍廣大的軍備計劃，得核准特別支出五萬萬一千六百萬圓，計劃原訂分十年施行，可是在一九〇三年底，即已先期完成了。一九〇三——〇四年度預算預計歲入二萬萬五千一百七十萬圓，歲出二萬萬四千四百八十萬圓。該年度開始的時候，國債總數爲五萬萬五千九百〇四萬圓（約十一萬萬七千萬金馬克）（一）

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共在國內外發行戰債十二萬萬八千〇五十六萬六千圓。戰費總數據海

(1) Hefferich: Das Geld im Russisch-Japanischen Kriege, a.a.O.

爾飛利希估計爲十一萬萬六千萬圓，而美國方面則有人估計爲十三萬萬二千萬圓。日俄戰爭的結果，雖說沒有使日本能獲得戰爭賠款，可是其東亞一等大國的地位則從此確定了，英日續訂同盟尤爲外表上的成功明徵。自此以後，直到世界大戰發生，日本的經濟與隆繼續邁進，地理地位、氣候、礦藏以及人民檢樸都足以助此發展，所以戰爭的損失是很快復原了。不過在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向海外移民，因而引起了糾紛的可能性，而這可能性尤其是對美國潛伏得很深。日本的興隆，在繼續上長的歲計數字中也可以看出來：一九一三——一四年度預算歲入爲七萬萬二千二百萬圓，歲出爲五萬萬七千四百萬圓。其前若干年來已經有規則地年有盈餘，而該年的盈餘尤爲最大，共有一萬萬四千八百萬圓之多。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的國債共爲二十四萬萬九千四百萬圓（約五十二萬萬一千二百萬馬克）。但美國方面估計一九一四年日本的國民財富只有四百八十九萬萬馬克。（二）

隨着財政上的新建設，日本幣制也取得了新的秩序。一千八百七十年間充斥市面的紙幣，至

(1) Simon: Reparation und Wiederaufbau, a. a. O., S. 266.

一八八五年爲止是逐漸減少掉了，自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現銀付款。此外本來仿照美國式制定的銀行組織也按照歐洲的榜樣改組了。舊有的國家銀行是取消了，一八八二年另設日本銀行，其業務的範圍頗與其時的德國國家銀行相類，惟有日本銀行有發鈔之權。前文已經說過中日戰爭中國敗績，曾擔負鉅額戰爭賠款，這筆賠款正好可以使日本改行金本位，於是日本不費任何重大的犧牲，便於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頒行了金本位法。新金圓相當於德幣二·〇九金馬克。日本銀行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金有一萬萬一千七百萬圓。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鈔票的準備金曾見減少，並且同時又流出現金一萬萬圓，不過這筆流出的現金隨後又因外國的借款而復行還原了；至於國內的交易流通會否使兌現發生困難，則無可稽考。爲了供應前線的軍旅，一共曾發行過六千三百萬圓戰時鈔票，那種鈔票則會有時難於兌現過。(三)隨後日本銀行又能增加其存金量，一九一三年底共有二萬萬二千四百四十萬圓（四萬萬六千八百九十萬馬克）(四)

(三) Helfferich: Das Geld im Russisch = Japanischen Kriege, a.a.O., S. 65 ff.

(四) Helfferich: Das Geld, a.a.O., S. 202.

## 四 世界大戰

（綢繆不足，乃以發行紙幣與公債爲助）

當世界大戰，在一般眼光認爲無可挽回的時候，全世界各重要地點的交易所都窒息在擠賣的空氣之下。爲保護證券的所有權利益計，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維也納、布達佩斯及不魯捨爾的交易所都宣告停業，而其後數日彼得堡的交易所也宣告停業了。巴黎的交易所先在七月二十七日局部停業，等到七月三十日乃與紐約的交易所一同仿效其他交易所的榜樣而停業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柏林交易所的營業也停止了，而同日倫敦交易所，不列顛的主要金融機構和國際清算的中心也——在不列顛帝國歷史上爲第一遭地——關閉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參戰各國都停止兌現，將其存款保留爲作戰之需。只有英國因爲海外領土的關係僅能限制兌現，並不能將其完全停止。在停止兌現與禁止現金出口以後，於是國際金融流通之平衡物是失去

了。更經英國發動的禁止與敵國通商，對敵國付款，一切對敵國的債權也無法收回，票據、證券也無法出讓。國際的金融與資本市場是不復存在了。(一)

### (一) 德意志帝國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國會通過五種戰時緊急財政法；這五種法律本來早在一八九〇年間即已預備好了，並且其後曾經數次增修。按其性質，這五種法律實是共成一個整體的，其目的在於實施財政的動員。帝國銀行是金融與信用的最後淵源，這五種法律即在於鞏固帝國銀行的地位，使其能從容應付因戰爭而起的新困難工作。德國為應付戰爭起見而施行這種法律，雖說是帶着強制措施的性質，脫離了四十年來保持着的金本位制基礎；然而其時軍隊動員所需的軍費共為二十二萬萬七千萬馬克，而為期又限於一個月，要是當時沒有這五種緊急法律來提高伸縮性，帝國銀行是絕難供應這種戰需的。

因為經驗上向來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通幣的需要是要增加，而有若干貨物只能在極賤的價

(1) Prion: Der Internationale Geld- und Kapitalmarkt usw., S. 16.

格之下纔能出賣，或是根本不能出賣，於是乃再行設立起貸款出納處，以維持幾種必要的經濟行業的付款能力。不過這次成立的貸款出納處和前此有相異的地方，其相異之點在於其鈔券根據銀行法的準備條款實與國家的鈔券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其發券的最高限制額也大為增加了。（一八七〇年為九千萬馬克，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十五萬萬馬克）按照緊急法令，德國在緊急期間，即在人民執戈的時候，任何銀行不得停止付款，人人應受全部付款。這個措施雖說官方也覺得詭異，不過後來因為另行頒佈一般延付的法律而停頓了。但是在對外貿易上，以及在受敵人侵犯影響的地方，如果出於戰爭上的理由有必要的話，依然是另樣待遇，並不能一概停付。按照帝國銀行總管處的意見，所有貸款出納處以及一切臨時設立的機關，其主要目的即在於廣為貸放信用，以示前此關於信用流通的過度憂慮是並不確實。

在緊急立法停止兌現而外，更補充以若干禁令，禁止金交易，禁止以德國硬幣為貼水的交易，更禁止金出口與金過境轉運。戰爭準備庫的藏金是全部移交帝國銀行，同時喚起人民的愛國觀念，設法幫助帝國銀行增加存金。結果帝國銀行的存金量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達到了最高

點，共爲二十五萬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其後即在一九一八年底也還有二十二萬萬六千二百萬馬克。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底止，德國對外支付差額共負一百五十乃至一百六十萬萬馬克，除輸出現金約十萬萬，出售外國債券約三十萬萬，國內債券約十萬萬馬克外，其餘悉係由發行外債抵償的。(一)

在戰爭開始以後的最初幾個月中，預算的假定戰費即已明白不足。平均每月在作戰的第一年要用十七萬萬馬克，第二年每月二十萬萬馬克，第三年每月三十萬萬馬克，在最後的五個月每月四十四萬萬馬克。海爾飛利希總計一切費用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共費一千四百七十三萬萬馬克。不過這數字是稍多於實際的戰費，因爲先此在和平年間，海陸軍以及殖民地的度支即已大增，而這筆增加的費用是也計算在上面數字之內的。羅茨教授 (Prof. Dr. Walter Lohz) 根據較精細的計算，共得一千三百七十四萬萬〇八百萬馬克。美國銀行信託公司 (die

(1) Grüger, Dr. Franz: Wirkung des Krieges und der Kriegsfolgen auf das Deutsche

Bankwesen (Untersuchungsausschuss für das Deutsche Bankwesen 1933), S. 7.

Amerikanische Bankers Trust Co.) 曾據逐年躉賣指數計算，發表德國在歐戰中的財富損失爲七百八十一萬萬馬克。(二)

作戰必需款項是先由立法機關以戰爭信用 (Kriegskredit) 的形式核准，總數共爲一千三百九十四萬萬九千九百萬馬克。在帝國政府需款的時候，隨時在核准的範圍以內以庫券向帝國銀行貼現，而帝國銀行爲避免紙幣膨脹起見，照例每半年發行戰債一次，任人應募。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德國長期戰債額爲：

|      |                   |
|------|-------------------|
| 五釐戰債 | 七七、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
| 五釐庫券 | 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
| 四釐庫券 | 八、八八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
| 共計   | 八八、九八七、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

債券是以「國民認募」(National subscription)的方式發行，並不經過一個銀行團之手

(二)Fisk: The Internally Debt usw., S. 18 u. 203.

而發行；一切銀行儲金處，其後還有郵局，都是經募機關。認募是自由的，可是招徠應募的活動則爲前所罕見，並且在交易所中經過整個戰爭時期自始至終，也未確定官定行市，以求用度剩餘的錢廣爲集中於戰債的應募。然而這並未能阻止自一九一六年秋季起發生了所謂的「流動公債」(schwebende Schuld)，而這種債務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數竟達到五百五十萬萬六千萬馬克之多。

原來以爲大戰在一九一五年可以終結，所以沒有着手在租稅上設法，等到一九一六年度的預算，這纔由國會通過了新的稅收法律：提單稅法，經由提高郵電費而增加的特別稅收，菸稅的增加，以及收據印花稅法（其後改爲交易稅）等等，使每年稅收有增加五萬萬四千萬馬克的希望。此外又制定了戰爭贏利稅法 (Kriegsgewinn steuergesetz)，其後一稱戰稅法 (Kriegssteuer-gesetz)，該法規定對於個人有財產增加稅 (Yermögens zuwachsteuer)，對於公司團體有剩餘盈利稅 (Mehrgewinnsteuer)。

在一九一七年度國會又增訂煤稅法 (Kohlen Steuergesetz)，人貨運稅法 (das Gesetz

über die Besteuerung der Personen- und (Friedenverkehrs), 戰稅帶徵附加稅法 (das Gesetz über die Erhebung eines Zuschlages zur Kriegsteuer) 增加了十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馬克新稅。從戰稅及其附加稅一共會徵得四十八萬萬八千八百萬馬克。

一九一八年度國會又會增訂新法，大大地增加了飲料稅（酒、噴沫酒類、檸檬、啤酒），提高了咖啡茶葉的關稅，獨佔經營燒酒。此外又修改了印花稅法與票據稅法增加稅收，而經由郵電費而增加的稅收與戰稅也格外地加高了。總共增加稅收估計不下四十三萬萬八千一百萬馬克。不過這些新稅有一大部分因為施行太遲，後來並未實現。

### （二）奧匈

對於戰爭爆發後所引起的恐慌，奧匈帝國在事前並未有充分的預備；因而雖是發行了大量的小額紙幣，仍舊不足以應付。奧匈銀行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準備金項下尚有十萬萬〇九千五百萬克隆現金和五千四百八十七萬三千克隆的外匯信用票。可是此後則日益減少了。該行雖曾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決議現金與外匯信用票只作供應國家的需要之用，僅在特殊例

外的情形之下亦供在外國發行外債付息之用，然而存金與外匯信用票的總額，仍舊免不了繼續下落，主要的原因在於奧匈本來不甚流通現金，無從自民間吸收補充，而奧匈本國亦不產金。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只剩了二萬萬六千七百十二萬克隆，現金和一千七百七十六萬五千克隆外匯信用票。在翠麗希（Nurella）維也納的匯票在戰爭期間即已大為跌價，及至一九一八年九月乃達到最低點，貼水行市達百分之一八五。奧匈帝國也曾徵收過戰爭稅，不過估稅的方法至不完全，除掉對公司徵稅，尙能相當準確而外，對於個人的剩餘收入徵稅極不普遍，而對於農民大眾，則反超出他們的負擔能力以外。

奧國財政部曾發行過八批戰債，都曾公開徵募。票面總額共為三百五十一萬萬二千九百萬克隆，實得三百二十九萬萬五千五百萬克隆。匈牙利財政部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一八年六月止共發行過十七次公債，其中十三次曾公開徵募。票面總額為一百八十五萬萬五千二百萬克隆，實得一百七十九萬萬五千六百萬克隆。奧匈帝國有擔保公債總數於其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分國時共為五百一十五萬萬〇七百萬克隆。其時奧匈銀行對奧國財政部的債權為二

百六十萬萬〇六千萬克隆，而對匈牙利財政部則爲九十九萬萬〇九百萬克隆，兩共三百五十九萬萬六千九百萬克隆。奧國財政部曾在德國接受貸款二十一萬萬二千四百萬馬克，匈牙利財政部同樣接受貸款十三萬萬三千六百萬馬克，兩國共在德國借款三十四萬萬六千萬馬克。(一)

按照兩國最高審計院的報告，總戰費共爲六百五十一萬萬五千八百萬克隆，以和平時代克隆購買力計算合爲一百六十七萬萬一千六百萬克隆。(一)藉助物價指數換算的結果，發現了一個有興趣的事實，卽在一九一六——一七年度時，戰費已經就跌落到百分之五十二了。(二)前文已經述過的美國銀行信託公司所估的數字，則比較還要高一些；該公司估計奧國受戰爭損失的財富爲二百二十八萬萬馬克。

### (三)英國

大戰的爆發在英國會使金融市場受了很劇烈的動搖，尤其是一班外匯行號受了外國延遲

(1) Popovics: Das Geldwesen im Kriege, Wien 1925.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付款的影響，恐慌頗甚，這是財部所不料的。雖說恐慌最緊張的一日爲禮拜日（八月二日），而接着第二日又爲銀行的例假日，銀行有了兩天停業的機會，仍是不夠，一直等到八月六日財部準備好了應急的措施，銀行只纔重新開業。應急的措施是：發行紙幣；宣告信用票延期付款一個月；信用票在英格蘭銀行貼現由國家擔保；以及由英格蘭銀行向匯票承諾人宣告，匯票到期，該行可以放款清償。其時政府擔保總額共爲五萬萬鎊，該項擔保款項除掉極少的幾百萬外，其餘都是在隨後完全清償了。（一）爲了恢復銀行的信用起見，英格蘭銀行並未停止付現，僅向公共界申請，避免呆藏現金。貼現率在銀行放假日時本已提高到百分之十的，後來又能逐漸低減了。爲維持英格蘭銀行的地位計，英政府並未向其要求國家借款以增加其負擔。

戰爭財政的供應，一部份是假道於發售庫券，庫券的期限長短不一，而利率也高下不等，自三釐半起以至六釐。此外亦會發行中期的公債。戰費的大部是得之於三批戰債總數十八萬萬七千三百萬鎊，和勝利抵押公債（Sieges- und Forderungsanleihe）四萬萬七千五百八十四萬一

{ } Lloyd George, David: Mein Anteil am Weltkrieg, I Band, Berlin 1928, S. 72 ff.

千鎊。

在戰爭一經爆發以後，所得稅是立刻加了一倍，而其後且更大為增加。各種賦稅，和奢侈品的關稅是增加了，此外又加添了若干新稅。一九一五年底即已徵收戰爭贏利稅，對於超出戰前標準的剩餘贏利，最初是徵收百分之五十，一九一六年百分之六十，一九一七年百分之八十，這樣一共徵得六萬萬四千五百萬鎊（一百二十九萬萬馬克）。（二）

英國會貸與其各自治領及各協約國十九萬萬五千四百萬鎊，而自己則接受貸款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鎊。英國的戰費總共為六十五萬萬五千萬鎊（一千三百十萬萬馬克）；按照美國銀行信託公司的估計，戰爭耗費英國的國富約八百〇八萬萬馬克。

#### （四）法國

法國在戰爭爆發以後，曾頒佈法令延遲付款（Moratorium），其後這延遲付款的辦法且擴充範圍，亦適用於銀行存款與儲蓄金，這樣會使恐慌的程度更加銳化。在作戰最初數週中，西北工

(1) Jessen, Jens: Kriegsfinanzen im Wörte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Berlin, 1932

業區即告失陷，因而情勢愈見惡化。其最大的影響是使稅收大爲減退；其後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實施所得稅，同年又施行若干新稅，這樣，短少掉的稅收纔能補足起來。因爲法國公家在大戰爆發以前不久對於長期的在外國發行的公債經驗至爲不良，所以法國政府在戰爭初開始的時期，大都借助於短期臨時借款，頗使法蘭西銀行增加很重的負累；後來也曾僱用過中期的借款。法國共計發行過四次長期戰債，在國內獲八百〇三萬萬八千九百萬法郎，在國外獲得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萬法郎。戰費至一九一八年底止共爲一千四百四十七萬萬七千四百萬法郎（一千一百五十六萬萬一千九百萬馬克）。（一）按照美國銀行信託公司的估計，戰爭耗費法國國富約四百二十四萬萬馬克。

#### （五）俄國

俄國的財政部曾得於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下哀的美敦書以後，大戰爆發以前的期間，把俄

(1) Tyroky: Les Finances de Guerre de la France, Paris 1926, S. 139.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Französische Serie.)

國國庫和帝俄銀行存放於德國的款項，大部提回。其存放於法國的五萬萬法郎，則因為法國宣告延遲付款的關係，等到一九一五年纔得到解決。在這同盟方面所造成的困難而外，更加上了敵國方面造成的困難：在波羅的海與黑海被封鎖以後，俄國在軍事上在經濟上都感覺到隔絕的痛苦。在戰爭開始以後不久，就宣告停止兌現，而中央銀行貸放信用的可能也大為推廣了。其時現金準備雖說尚稱比較地充實，然而在倫敦市場上盧布行市已經在開始跌價了；至一九一五年五月敗績為止，盧布跌價從來不到原價的百分之八十以下，自此以後到秋天乃跌到約百分之六十。革命起後在八個月間，盧布跌價只剩了原值的一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盧布的價值只剩了百分之二五·七。新增的若干稅收也不足以供應戰費，因為在動員以後曾有令禁止出售烈酒，這樣會使燒酒專賣的收入大大地減少。

因此俄國只有側重於發行公債之一途；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為止共發內國公債一百七十七萬九千萬盧布，其中一百二十萬萬一千萬盧布為長期有抵押公債。此外俄國至同時期為止，曾在外國——英、美、法、日本及意大利——發行公債七十七萬萬八千八百萬盧布，所以總計帝俄的戰

債共爲二百五十五萬萬七千八百萬盧布。戰費不足之數，則以庫券向帝俄銀行貼現補充之。帝俄政府的總戰費至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爲止，共爲三百八十六萬萬四千九百萬盧布（八百三十五萬萬八千二百萬馬克）。（一）據美國銀行信託公司估計，俄國因戰爭而受的國富損失約爲三百〇九萬萬馬克。

#### （六）意大利

前文已經說過，當歐戰爆發的時候，意大利征服特里波里斯所耗的費用，尙未能復原。因爲在其中的時期，曾力求增加其軍備，期與其他列強相埒，所以在一九一四——一五年度歲計即已不足二十八萬萬三千五百萬里拉。在其後戰爭年間，歲計不足日益增加，一九一八——一九年度不足之數達二百二十七萬萬七千六百萬里拉。總計作戰五年間共計不足六百二十五萬萬一千九百萬里拉，全部爲臨時懸欠的債務。意大利的弱點會反映於其倫敦外匯行市上：金鎊對里拉的金平價爲一鎊對二十五·二二里拉，一九一七年行市，變爲三三·〇三，一九一八年三〇·三一。

（1）Apostol, Paul N.: Credit Operations a. a. O.

意大利政府雖曾增加稅率和施行火柴、紙牌、咖啡專賣，然而對於戰費負擔都未曾有重大的輕減，只有一九一五年底施行的戰稅，因其稅率日益增加的關係，曾能有相當的補助。一九一六——一七年度徵得一萬萬二千二十萬里拉，一九一七——一八年度：四萬萬五千一百六十萬里拉，一九一八——一九八萬萬〇五百八十萬里拉。意大利的國債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爲一百五十二萬萬八千一百萬里拉，因戰爭關係，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乃增加到四百九十九萬萬二千萬里拉。此外意大利又曾在外國借款一百九十二萬萬〇六千萬里拉。共計戰爭耗去意大利一千一百六十三萬萬里拉（一）（九百三十萬萬〇四百萬馬克。）美國方面估計因戰爭而生的國富損失爲一百八十八萬萬馬克。

（七）日本

在大戰中日本陸軍的活動只以東亞大陸爲限，而其海軍的動作亦不出太平洋的範圍。在青

(1) Einaudi, Luigi: *La Condotta Economica Egli Effetti Sociali Della Guerra Italiana*

(*Wirtschafts- u.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Italienische Serie*) Bari 1933.

島既經征服和希派伯爵 (Grand Duke) 艦隊沉沒以後，日本在軍事上已無用武的必要，因此其軍費是至爲有限，尋常的國家歲計可以應付裕如，且有剩餘，得減少其外債二千鎊又兩萬萬法郎。其本國所需軍需材料爲數極微，因而可以將其材料供給其他協約國，總值共達六萬萬四千六百萬圓，卽作爲貸款；其中英國得二萬萬八千萬圓，法國得一萬萬二千六百萬圓，俄國得二萬萬四千萬圓。日本的國債在一九一八——一九年度終了時共爲二十五萬萬八千萬圓（約合五十三萬萬九千萬馬克）與戰前時代相較無甚變更。按照前之屢經提述過的美方估計，日本爲參加各國中唯一有財富增加的一國，共增加約三萬萬馬克。

#### (八) 美國

美國在大戰的初期，約至一九一四年底爲止，曾遭遇一度恐慌，因爲其時出口是被阻礙了，中歐已不復能爲顧主。不過自一九一五年起協約國購貨增加，於是經濟復趨興隆；經濟復呈活躍，新銀行法案頗能使流入的現金很鉅的地集中存蓄起來；稅賦低而不重。自其加入戰爭以後，卽代替了英國的地位爲主要的金融接濟國，貸與協約各國的信用達九十五萬萬金元。於是稅率也緊張

起來了，尤其是新施行的所得稅，此外更曾補充以戰稅。美國公債總額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來只有九萬萬七千二百萬元，經過發行了三批戰債，一九一九年乃增加到二百五十二萬萬三千四百萬元。總計美國的戰費估算爲三百五十萬萬元（包括貸與協約國的信用在內）。美國的各債務國中，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計英國欠三十六萬萬九千六百萬元，法國欠十九萬萬七千萬元，意大利欠十萬萬三千一百萬元；其餘的七十萬萬〇七千七百萬元，則係分配與各小國。（二）美國銀行信託公司估計戰爭損害美國的國富約五百十六萬萬金馬克。

(1) *Fisks, a.n.O., p. 316.*

## 五 總論

過去百年中的發展明示了列強曾先後努力將其幣制改爲金本位，並爲安全起見，力求增加其金存量。德國與日本是因戰爭勝利，獲得賠款，乃得利用該款而步英國的後塵，改行金本位。而法國亦於敗績復原以後，首先廢續其因不幸的戰爭而中頓的幣制發展。俄國與美國則因本國產金的關係，改行幣制是比較的便利；至於英國則雖有加拿大與澳洲的金礦，仍嫌不足，更要開端南非戰爭——一個時期特別長而費用特別貴的殖民地戰爭——去將其範圍以外的世界重要產金地也征服過來，從此乃得在金市場上維持不列顛的盟主地位。

在歐戰過程中，一般起初是憂心現金準備，以爲金準備如果分散而不統一，遲早會引起幣制不穩的現象的，繼則極度崇信金藏，存金乃自成了目的。(一)就是德國也未嘗能免這種現象。德國

(1) Cassel: Das Goldwesen Nach 1914, Leipzig 1925, S. 11.

帝國銀行隨時公布其存金量，分明是在追隨一種尊嚴政策，在戰爭初期，是輕易不肯挪用存金的。在經濟的自然過程中，在某種情形之下，一定是要遭遇到限制的，然而在戰爭期中，這些情形之下的限制，則因存金特大的原因而能勝過了。一國苟無存金，則更易被敵國封鎖。貨抵貨的辦法在國際貿易上只能算是一種逼不得已的辦法。而在戰爭之中，這種辦法，有時也很困難，因為在戰爭中，貨物交易與平時完全兩樣，貨既不同，運輸路線亦有變更。法將莫達克（Mortiacq）曾於新近出版的大著中再三述明充分金準備之重要。德國增加金準備的辦法，在戰中最後只剩了沒收金質的裝飾品。

我們在前文已經看到，英國居金融國的首席，在反拿破崙戰爭的時候，即已敢於首先向其人民徵收所得稅，作為一種戰稅。亞丹姆斯密斯（Adam Smith）關於此點曾說過：多數現代的國家，在和平時代其經常支出是與其收入相等或近於相等的，所以當戰爭來之時，這些國家的政府是既不敢亦不能設法增加其稅收，以求與其增加的支出相等。它們是不敢，因為害怕其人民不願陡然地大增租稅是會使人民厭惡戰爭的；它們是不能，因為它們不知道有什麼稅，可以供應如許

大的款額。借款的方便法門乃使這些政府逃出窘境，要是不然，它們既不能又不敢增加租稅，那必然是會遇到這種窘境的。經由借款，這些國家乃得在略加租稅之下一年一年地慢把戰爭所需之款徵集起來（指逐年以租稅得款攤還戰債），而經由長期借款（公債為期甚長，歷年由國民收入中吸取稅收攤還）的方法，乃得極小的租稅增加集起鉅大的款額。在大國中，首都的居民，或是去戰場稍遠地方的居民，真是對於戰爭的艱苦，無甚感覺，很舒徐地在大都會出版的報紙上暢讀其「海陸軍的偉業」。英國的租稅政策，向來是能符於目的，而且又能深知人民心理，素為各國之冠，即在大戰期間，英國亦知善於維持其此種優勢，其時英國戰費的百分之十二係出自租稅。德國與法國的租稅系統，在大戰時尚未發達到能適應戰爭需要的地步，利用直接的所得稅作為一種戰稅尚不可能。至於奧匈與俄國，則經濟的發展更為落後，類此的租稅觀念，根本還談不上。在將來要着重解決徵稅的問題和戰爭贏利的問題，務求消除不正當的不公正的財富移轉，庶不致造成內部分裂的原因（指財富不均，引起社會革命）。至於在這一方面能達到什麼地步，則是一個心理上問題；其解決要以國防科學問題的一般教育為前提條件。

這次世界大戰，需要浩繁，列國大都缺乏這種教育，因而不得不藉發行公債以爲供應。尤其關於動員時的需要，羅茨（Walter Lotz）曾指明過，作戰各國，在戰爭爆發時，沒有一國能避免掉以人工的方法增加購買力——即是增發紙幣。英國其所以表面上不若他國之甚者，是因爲該國並未立刻動員百萬大軍的緣故。各國戰爭財政的技術率都建築在這樣一個原則之上：以庫券向中央銀行貼現或在公開市場出賣而取得必要的資金；以長期的，帶有異常動人的高利率的公債去抵償短期的臨時債務。一切作戰國家，甚且俄國，均自此等公債取得鉅大的款項。不過款項雖有相當的着落，而實物財貨則仍然無法增加，比如俄國因波羅的海與黑海被封鎖，奧匈與德國則因敵軍封鎖和經濟戰爭的關係，和經濟的存貨日益緊縮，戰中迄未得設法充實復原。此外各作戰國，亦曾經由實施定量分配制度和限定最高物價的辦法，節省下若干款項。終則，個別政府亦有諄勸人民，將其求投資的儲金購買戰爭公債者。在戰爭開始以後，德國和其他各國都曾停止交易所營業，其主要目的即在於便利發行戰債；在戰爭期間交易所迄未開業。在設法控制資本而外，更舉行盛大規模的宣傳——演講、貼標語、放映影片——促動人民認募戰債；這種宣傳尤以在英美爲最

甚。在德國因爲受了封鎖的關係，債券只能機械地在春秋兩季發行，而英國與其他協約國則因仍得與世界市場有聯系的關係，會得經由普通賒買的途徑，自美國賒入貨物，數量日益加多，終至於把美國也牽入它們的漩渦。

前文已經敘過，列國政府不能藉賦稅適應軍火、物料、交通工具、與工作力的消費，因此隨着它們的戰爭財政方法，經由戰債發行與紙幣發行的聯系化，以及出於金融大國與其協約國間的關係，乃產生出種種經濟循環的現象，與自然的經濟循環不同，只能適應戰爭的需要，實是一種有缺限的循環。至於這種循環，其所以尙能維持到戰爭終了時期者，則因爲一方面民衆對於濫發紙幣的影響，尙沒有深切的認識，而另一方面，人民在戰爭開始以後，各以爲戰爭有望，如對於其本國政府信託彌堅。這種信託的程度之深，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像法國在十九世紀中一樣，如果戰債是很踴躍地爲人民所認募了，那也就等於人民對於政府的戰爭政策是投了信任票了。

在德、奧、匈崩潰以後，戰勝各國似乎並未遵守停戰以前所承諾的威爾遜原則行事，復行按照十九世紀中流行的辦法，要戰敗國向戰勝國賠償戰費。款額是太大了，現金償付是絕對辦不到，於

是在美國金融界的合作之下，乃構成了一種發行公債的技術來應付這局面：這便是最初的「道氏計劃」(Dawes-Plan)與後來的「楊氏計劃」(Young-Plan)。不過在這兩種計劃之下，德國的賠款能力是取決於其輸出貨物的能力的，其後各國紛紛提高關稅，限制輸入量，馴至這唯一的賠款門徑也宣告阻塞了。經濟與金融的利害關係，發生了背道而馳的現象，負長期債務的營業界（在道揚兩氏計劃下，有所謂賠款商業化的口號，即德國交出若干德國營業界負責賠償的債券交與協約國，由協約國發行），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得另求短期臨時借款來償付長期債款項下的分期本息，這樣，短期債款日益累積，前途頗為黯淡。一直經過德國無數次的訴苦與解釋，尤其是德國國家銀行夏赫特（Dr. Schacht 現任經濟部長）所著的「賠款之終局」(Das Ende der Reparationen)一書，(二)這纔能把賠款的問題，告一段落。德人稱譽夏氏之書，對於解放德國經濟奴化與黑奴（天錄）解放黑人有同等的功績。此外其他各國，在發行債券的技術上也曾有過甚的情形，有待於整理。這兒也許有從政治方面來照明這問題的價值。

(二) Schacht, Dr. Hjalmar: Das Ende der Reparationen, Oldenburr 1921.

在和平時期的政治中，首先要預爲綢繆的就是要在財政上準備未來的戰爭。亞丹姆斯密斯言之頗確：「當今的（斐列二世）和前一世的普魯士王是自從法國亨利四世逝世（一六一〇）以來歐洲大王侯中僅有的兩位，曾聚斂過可觀的庫藏。儲蓄之源的儉樸是在各共和國與在各專制國中一樣地希罕。」我們在前文已經看過，斐列王曾經由種種的措施——尤其是當時增加額外購買力所慣用的方法，鼓鑄劣幣——能善於經營，優於其敵人，所以在七年戰爭告終的時候，並未曾出於經濟的顧慮，而有先期媾和的必要。拿破崙一世曾引斐列大王爲做軍人做政治家的榜樣，然而他後來是失敗了，其失敗的原因，自經濟上言之，要不外於其敵英國另有其戰爭財政的辦法：英國其時多年未受敵國侵犯，爲海上的霸主，會自行發展出一種以信用爲基礎的，不過度緊張的戰爭財政，與歐陸各國不同。英國憑藉這種戰爭財政之助，不但可以維持其自己，且可發給資助，應援大陸上疲竭的普魯士、俄國與奧國繼續作戰。然決勝之點並不在於金錢，而是在於同盟各國在戰場上擊敗拿破崙，因而促成拿破崙霸權的崩潰。拿破崙與英國這兩個主敵的榜樣教訓了我們，戰爭財政並沒有嚴格的原則，而是要適合於當時經濟與社會發達的境地而構狀發展的。

十九世紀中歷次戰爭與反法國革命的戰爭和反拿破崙戰爭有相異的地方，諸次戰爭不則是在主要交通綫以外，如克里米亞戰爭，俄土戰爭與巴爾幹戰爭，或則是發生在殖民地地上，如南非能人戰爭與俄日戰爭，或則是出於靈敏的政治手腕，戰爭的範圍只限於局部，如美國的南非戰爭，與德意的統一戰爭。在邊遠或殖民地的戰爭上，財政的因素是比較地不甚明顯，因為列強是不願爲了不發達的或殖民的土地而將其整個的國民經濟作孤注一擲的；在後述的局部戰爭中，財政的因素亦不甚緊急，因為個別國家作戰是比之於大規模的混合共同戰爭易於達到目的。把歷次戰爭一般化起來，而尋求一般的原則，雖是不易，然而海爾飛利希則曾於一九〇六年嘗試過從其時新結束的日俄戰爭中求取戰爭與財政間的聯系，他斷言說：「對於戰爭之發生與進展有斷然重要的不是金錢而是刀劍。」（三）所以他的意見正好是與克勞賽維茨（Clausewitz）相同：單是財政的力量，並不足以使戰帥放棄從戰鬪上尋勝負的必然性。這當然並不是否定財政的力量對於戰爭的發生與進展可以有斷然的影響。即就日俄戰爭而論，俄國的財政地位確曾爲其

(三) Helfferich: Das Geld im Russisch-Japanischen Kriege usw., S. 280.

作戰的有力後盾，而日本則是因爲出於財政上的隱憂而未能作戰到底的；換言之，日本的政治家已經認爲有放棄作戰而媾和的必要，雖說日本的戰帥還有最後推展的可能。

世界大戰耗費之鉅，使參戰各國都感覺到驚駭，雖說一般是早已聞知，自十九世紀以來即已發生了三個因素，在在都要增加作戰的戰費。在十八世紀逐漸過渡到十九世紀的時期，各國率都施行了普遍服役義務的制度，可能軍役人員的數字大爲增加；不過話雖如此，軍隊的人數其時仍然有相當的限制。一直等到了一千八百五十年間，鐵道的建築是開始了，隨後日益發展，至十九世紀末年，百萬大兵的動員與供應乃都可以實現。終則，自千八百九十年間以來，技術日益發展，並且推入戰術之中來了；一部分是屬於機器的使用加強戰器的實力，而另一部分則是屬於馬達力的使用代替了從前的馬隊。在這三種因素在戰爭時可以自由發動的地方，如在人口衆多的，交通工具進步的和工業發達的歐洲，那些作戰的國家勢必至於像英帝通商部長冷亞曼（Ranvier）所說，有國家破產的危險，如果一定要求得有勝利的戰爭結果的話。而在另一方面，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不久的巴爾幹戰爭則明示了，在交通技術與工業尙未充分發展的戰場上，就是大

體上以農爲本的國家，財政力比較薄弱，也能維持長期的戰爭。（四）

在歐戰中戰費雖是激增，然而戰費的張羅並未能使戰爭早日結束。凱因斯（Keynes）曾揭示過，早在一九一六年底，英國的國家財政就已有涸竭之虞，不過卻好在這個時候，美國以其生力的後盾加入協約國方面，於是乃得支持危局。所以倘使人們想到，就是富豪的英國，有時也都曾瀕於危境，那末我們德國人確是可以疑問，德國改組以後的最高指揮部的遲延的作戰計劃，是否是否忘記掉希烈芬伯爵（Graf Schlieffen）的名言了。希氏聞名會說過：「當百萬大軍需要億兆的給養費的時候，疲憊延遲的戰略是不可從事的。」

大戰的代價是太大了，歐洲戰前在全世界稱霸的地位也因而一部是犧牲掉了。這鉅大的損失，只有戰勝國與戰敗國重新樹立起共同的意志纔能補救。可惜我們（指歐洲人）並沒有能像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有林肯（Abraham Lincoln）戰爭告終已經十七年了，歐洲主要國家的貨幣根本都沒有能穩定；這前題都未能辦到，國際經濟關係的再建設，自是談不到了。

(註) Ivesque: Les Finances de Guerre au XX<sup>e</sup> Siècle, Paris (V.E.)

至於如何減低新時代戰費的問題，可以一八七〇年德軍動員爲一良好的榜樣。該次戰爭與聞名的過度耗費的美國南北戰爭不同。在南北戰爭中，南北雙方，事前都沒有充分的準備，所以有許多支出是不必要的浪費。而在一八七〇年戰爭中，德國以一八六四與一八六六年兩戰之經驗爲基礎，對於動員的計劃，逐步都有詳細的規定，所以在實行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浪費的地方。至於上次世界大戰，德國的事前預備則有不周到的地方。直到一九一四年爲止，德國既沒有明白組織的統制機關，如一八七〇——七一年戰爭中的三頭會議，以普魯士王爲領袖，而準備的任務範圍也未能儘量推廣，雖說會頗有人主張組織所謂的「經濟的參謀本部」（Wirtschaftlicher Generalstab）應勿以爲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集中在戰地鐵道長官（Feldwirtschafschef）的管理之下即爲已足，應當更進一步，把經濟也集中在一個戰地經濟長官（Feldwirtschafschef）的管理之下，任其有權把經濟從平時經營轉變成戰時經營。這樣，在戰爭爆發後的初期，原料的集中管理便不至於毫無準備，以至後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地——按照敵人封鎖寬嚴的程度——慢慢應付，受許多弊害。後一辦法的主要弊害在於投機者隨時狂熱地在那些尚未受統

制的經營中儘量操縱鑽營，擡高物價。比如鐵的生產就統制得太遲，而且統制得又極不完全；其原因在於其時一般過信平時的統計數字，以為鐵的產量總不會不足的。可是其後在一九一四年秋與一九一六年夏兩季大戰的時候，軍火感覺不敷應用，乃不得不加上幾倍的價格，以求推動鐵產量的增加。平心說，使德國企業界對於此點負責，似亦不甚公允；德國企業界確曾完成了德國最高指揮部的一切要求。戰爭敗績的原因並不在於材料的缺乏；反此，在停戰以後，德國軍需材料的囤集，爲量可驚。路德喬治 (Lloyd George) 於其戰爭回憶錄中曾以一全章歷敘所謂的「礮彈醜事件」(Shell-Skandal) 其中關於此一問題曾謂：「試回溯過去，即當毫無疑問，吾人於一九一四年時關於戰爭實可更佳地組織全國，並可更迅速地更便宜地將戰鬪導入於一成功的結果，倘使我們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就按照戰爭的標準而動員全國的人物與精力，並且有系統地，求取到底的勝利的話。在戰事快終局的時候，在相當範圍內是做到類似的地步了，然而前此我們則會經過了一段長期的鉅費的遲疑和浪費的序幕。」(五)

(四) Lloyd George: *Mein Anteil am Weltkrieg*, I Band, Berlin 1938, S. 286.

列國在戰後，除掉蘇聯而外，都會公開地想回復到戰前時代的經濟中去。但其後失業工人日益加多，很明顯，經濟本身已經沒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問題，這纔有人見識到，出於戰爭經濟的觀點，現經濟制度實有改組的必要。克勞賽維茨關於戰爭會著有典範的書籍，其書雖以狹義的戰爭為限，然於其中會謂，廣義的戰爭藝術實包括一切活動，爲了戰爭的目的而存在者，如整個戰鬥力的創造，即徵軍，軍備與行軍是。(六)克氏所指的一切不容忽視的職務，總括言之，即是今日所謂的戰爭經濟。克氏對於此點，雖有預見，然而在歐戰時，德國國家與經濟間的關係，並不和諧，以至在着手第一大戰爭經濟問題的時候，即製造人造淡氣的時候，即已發生了困難。海爾飛利希氏認爲反抗英國的經濟戰爭，非從自由經濟的制度過渡到計劃的貨物生產與貨物分配不可。渠對於戰爭經濟上的困難會擬有解決的辦法。渠曾指出大戰爭經濟上忽視之點，同時亦不脫離供應戰爭財政那個主要目標，去尋求解決的辦法。目下戰爭經濟的知識之推廣，倍覺需要；路德蓄治於其戰爭回憶錄中，對於英國政府如何組織全國資源，供應戰爭，不憚單調，詳爲敘述，關於此點渠在序言

(K) Clausewitz: Vom Kriege, Neue Ausgabe, Berlin 1935, S. 68.

中會請讀者原諒，並謂：「此種措施之研究，對於志在考究一國如何方足以在戰中或在平時有最佳組織之人，實爲絕對必要。」（七）在最近期間，戰爭技術，曾有不可否認的進步，萬一發生戰端，戰費之鉅，必更可觀，在此種情形之下，戰帥應力求速戰，尤亟於曩日。爲達到此目的起見，必須將由和平經濟化爲戰需經濟的必要時間，極度縮短，求其足以適應現代大軍作戰準備性的前提條件，卽是要求其能連續地供應軍火與資料。如果此種迅速的決斷戰辦不到，戰爭的結果必至於耗盡全部的經濟力，一如上次大戰曾把歐洲列強數百年來積蓄的精力，消費殆盡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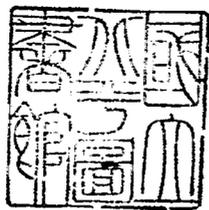
在世界大戰的前數年，晏幾爾（Sir Norman Angell）曾說過，一個戰敗的國家是不會有償付按照現代戰費計算的賠款的，因爲賠款的數目太大，而在我們經濟教育的現狀態之下，人類生來的「重商主義的」思想方式又是絕不容接受那唯一的償付方式的——卽是以輸出貨物償付。晏幾爾其時發刊其著作，是希望藉其深刻的影響去阻止威逼着的世界大戰。不過他忽視了，政治在民族的最後問題上不應顧慮經濟的獲益性，而是應採取戰爭的手段，倘使一切其他手

段總不能生效的話。其他手段，如大戰發生前所曾提議採用的中立國禁爲財政援助的辦法，據凱因斯（八）的意見，誠然可以逼着巴爾幹國家傾向和平，然而對於大國，這是無用的。所謂永久的和平乃所剝奪新起國家對抗老國家的可能性的。國防政策的作戰準備性不僅以生命，並且也正要使用財產去代諸現代國家衛護其生命空間的。只有具英雄思想的民族纔有將來，和平畏縮的民族不會有。

（八）Keynes, J. M.: National Finance in War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Band 74 (1929).

#### 參考書

（見原書六二、六三、六四頁）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戰 時 經 濟 叢 書

戰 時 經 濟 思 想

陳 允 文 編 譯  
一 冊 二 角

本書就 K. Hesse 博士所著 Der Kriegswirtschaftliche Gedanken 編譯而成，對於大戰前後關於戰時經濟問題之言論，有一系統的介紹，以啓導讀者研究此種問題之門徑。

戰 爭 與 財 政

三 冊 三 角  
H. Pantien 著  
楊 樹 人 譯

本書以時代爲經，國別爲緯，歷述德奧英法意俄美日諸國戰時財政之經過。歷史上有名之戰爭均在包羅之列。對於研究戰時財政者，必能有相當的貢獻。

英 國 工 業 的 戰 爭 經 濟

K. Romerinnann 著  
楊 樹 人 譯  
一 冊 三 角 五 分

歷敘前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統制原料分配，管理勞工關係，及限制物價等必要的戰爭經濟手段，而最後結論一章尤有參考價值。

戰 時 石 油 政 策

陳 允 文 編 譯  
一 冊 四 角

本書首論列強所採取之石油政策；次述日本在平時及戰時所需石油之數量；最後敘述日本如何設法充實其需要，分爲開採提煉，國外經營，法律制裁，國外輸入等四點，討論極詳。附錄日本有關石油專業之法令七種。

尚 有 多 種 陸 續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36278)

戰時經濟叢書 戰爭與財政 一冊

Krieg und Finanzen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H. Pantlen

楊樹雲 長沙 正路 五人

王雲 長沙 正路 五人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正路 五人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正路 五人

商務印書館 漢口 重慶 南昌 安慶 成都 西安 開封 金華 廣州 梧州 昆明 福州 香港 汕頭 貴陽 廈門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分發行所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九九七

有

